



2010年12月12日22期

总第六十四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本期目录

风云人物

[迟泽厚 不识时务亦俊杰——秘书眼里的黄永胜](#)

史林一叶

[丁凯文 也谈维特克访华与江青](#)

[胡庄子 红卫兵批诺贝尔奖](#)

蓦然回首

[方子奋 南京“12·10”公判四十年祭](#)

口述历史

[黄飞立 等口述 文靖执笔 从“特嫌”到“反动权威”——中央音乐学院](#)

[风雨岁月琐忆](#)

简讯

[樵 余 一位“历史义工”的自印书——介绍王坚勇著《折腾岁月小记》](#)

小资料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文摘

[艾仁宽 关于在英语教学中“编反动口号”的申辩书](#)

编读往来

[1、欧阳秋来信赞王锐文章](#) [2、南晓来信赞刘海鸥文章](#)

【风云人物】

不识时务亦俊杰

——秘书眼里的黄永胜

迟泽厚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相继开展的“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黄永胜被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中仅次于林彪的二号人物，在全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对他的揭发批判可谓铺天盖地，受其株连者不知几许。而我这个曾在13年间三进三出于黄永胜之门，背后被一些人定格为“黄永胜的老秘书”的人，在运动中却毫发未伤，特别是在黄永胜进京当了总参谋长之后，竟未发现我与黄永胜以及黄家有任何私下往来。有人表示惊讶：“你真不简单呀，想不到你早就对黄永胜心存戒备，保持了距离。”我赶紧声明：“我可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警惕性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我的想法很简单，人家现在是中央首长，日理百机，贵客盈门，我干吗去给人添乱，找麻烦？”

但是，我应了那句名言：在劫难逃，最终还是在“揭批查”运动中落马。倒不是查出我隐瞒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我对运动的“态度不端正”，“泼冷水”，“干扰破坏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批斗，“打态度”，不待运动结束，便将我赶出军区机关，发配湘西。

独树一帜的“揭批查”

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揭批查运动”，全面深入地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的各种罪行。当年11月中旬，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南下广州，亲自发动广州军区的“揭批查运动”。军委领导如此关心、重视广州军区，军区机关干部莫不欢欣鼓舞。文化大革命中，广州军区对中央文革小组和后来“四人帮”的指示多有抵制，遭到他们忌恨，经常受到敲打、刁难，军区上下早就憋了一肚子气，特别是1974年1月24日，江青派了3名特使给到任不久的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在广东省委领导中排名第四的赵紫阳送来她的亲笔信，布置他们在军队和地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随即造成军队、地方大乱，其中究竟有什么奥秘？大家渴望揭开。

但是，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几位领导都不提该清查“四人帮”的哪些罪行和如何进行清查，却大讲揭批“四人帮”与“批林”的同一性，说“路线斗争是两次，实际上‘四人帮’、林彪是一伙的”；并且要求继续揭批军区原领导人黄永胜、刘兴元、梁兴初、温玉成、丁盛、任思忠的问题。上述6人，黄、刘、温调离军区都已10年甚至10年以上，离开时间最短的丁盛、任思忠也已4年，但他们的的问题还要记在广州军区账上，并据此认定广州军区为“重灾区”。有了军委领导人的定调儿，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因为随意点名并公开宣布刘兴元、丁盛、任思忠“不是死党也是死党”，结果受到中共中央批评的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便理直气壮地宣布：“揭批查”必须联系实际，在广州军区，最大的实际就是要继续查清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问题。听了这样的动员，许多人窃窃私议：所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问题，是林彪的主要罪状之一，“九一三事件”发生已经7年，林彪集团的成员大部都在，特别是“四员大将”一个不缺，居然倾全党全军之力查了7年仍未查清，倘若不是以此做紧箍咒故意整人，岂不是太无能了吗？

在随后开展的运动中，我所在大组的领导要我揭发黄永胜的阴谋活动，因为我曾给黄永胜当过秘书。我认真对待党组织的决定，但我确实没有发现黄永胜有什么反党、反革命的阴谋活动。我根据自己对黄永胜的了解，讲了他在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的一些问题，但被认为回避要害，捂盖子，说我中毒太深，立场还没转变过来，对黄永胜还有感情，有幻想，根据就是我曾在十几年间三进三出于黄永胜之门，先后3次给黄永胜当秘书，“可见黄永胜对你的信任之深”，“难怪你不揭发黄永胜的罪恶活动！”

我确实曾在十几年间给黄永胜当过3次秘书，但这并非我之所愿，而且也并非出自黄永胜的提名。对此我不得不多着一些笔墨，加以说明。

意料之外的三进三出

1953年，我时任第55军党委秘书，军机关驻在湛江。5月2日，军政委王振乾同志突然找我谈话，说已决定调我给中南军区参谋长黄永胜当秘书；他还告诉我，黄参谋长刚从海南检查工作回来，现住军招待所，后天就回广州，要我到时同行。

事情实在来得突然。我从 1951 年开始当秘书，几年下来，深感这项工作担子很重，早就不太安心，今后到大军区机关，担子将会更重，而且我知道，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和第一副司令员叶剑英都已调往北京，黄永胜实际上是军事工作一把手，而我军龄短，做秘书工作的时间也不长，又不懂军事，实在难以胜任。我认真恳切地向王政委讲价钱，要求留在军里，他却说我不应该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不懂的事情可以学，只要勤奋努力，完全可以做好工作；他还讲了黄永胜的许多优点，说“黄参谋长是个洒脱人”，我在这样的首长身边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的意见全然无用，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分配。

我很纳闷儿，我与黄永胜没有任何历史渊源；中南军区下辖十几个军以上单位，怎么偏偏调我去当秘书？以后得知，就在黄永胜那次去海南时，他要他的老部下、海南军区政委陈仁麒为他再物色一位秘书。陈原任 48 军（后又改称 21 兵团、55 军）政委，我最初当秘书就是在他身边工作，他对我的印象不错，是他向黄推荐了我。

1953 年 12 月至次年 2 月，我随黄永胜参加了“党的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主要研究了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并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就在这次会议期间，黄永胜被任命为中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3 月初回到广州，机关精简整编，黄永胜处只留一名秘书。另一位秘书阳地同志资历比我老，秘书业务也比我熟，自然留他比我合适。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我深感作为军人却不懂军事之苦，决定趁机到军校学习。这时早已过了入学时间，经军区干部部特批，我到汉口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当了一名插班生。

这就是我在黄永胜处当秘书的一进一出。

第一高级步校是以培训营、连两级主官为主的军事学校。我虽然原有的军事基础很差，又是插班生，但我在文化知识方面占有很大优势，而且我的学习自觉性高，不怕苦、累、脏，成绩很快脱颖而出，一年半后毕业，名列全连第一，17 门课程，除一门为良好外，其余全部优秀。不料，就在即将毕业之时，突然收到阳地同志来信，他说自己当久了秘书，长期忙于事务，决心争取相机到政治院校学习，他已向首长建议，我毕业后回去接替他的工作，首长已经同意；他对未能事先征求我的意见表示遗憾，盼我谅解。我实在不愿再当秘书，但我同时得到一个消息：如我像一般学员那样由学校分配工作，很可能留校。两相比较，宁可重

操旧业。我就这样二次给黄永胜当了秘书。此时中南军区已经一分为二，主体部分成为广州军区，黄永胜任司令员。4个月后，阳地去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最高学府——政治学院学习。

1958年9月，黄永胜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我被安排到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部）任参谋。这可算是二进二出。不过这次出得不太利索，黄永胜在学习期间照常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召开的重大会议，他仍然需要秘书，自然还是我去。一共3次，累计时间约有半年。

1960年，黄永胜毕业回到广州。此时我正在西藏参加平叛。军区主管部门调于贯文同志来当秘书，他一干就是5年。1965年4月，41军362团政委出缺，这个团是老部队，于贯文是团级干部，他向41军首长和军区干部部自荐，都表示欢迎他去，但同时也都提出：“这事儿得黄司令员同意。”黄的夫人项辉方是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贯文先找项恳切陈情，项表示理解，随后黄也表示同意，但是提出须找到合适的接替人选并经试用之后才能放行。这可不是十天八天能办成的事，而团政委是一个团的党委核心，不能长时间空缺，于贯文唯恐错过这次机会，急得坐卧不安。世上偏有这等巧事：就在此时，军区收到总部的调令，要我到总参谋部作战部任参谋。能到统帅部工作，这是极大的政治荣誉，但我却另有考虑：第一，我不愿意在大机关工作；第二，早年我曾在北京求学，熟人很多，而且我的家庭成员也多在北京，这是在要害部门工作的一大忌讳。我向军区作战部首长汇报了我的思想和意见，作战部首长表示他们也不愿意我走，但是作为下级业务部门，不能同总部讲价钱，调令必须执行，劝我早日赴京报到。正当我为此烦恼之时，于贯文闻讯而来。他对我讲了一个“两全之策”。他说：“总部的调令，军区机关是抗不住的。你若是去了总部，以后就很难再挪窝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把首长（黄永胜）的牌打出来，请作战部或干部部给北京打个电话，说你是首长的老秘书，在总部的调令下达之前，已经决定回到首长这里工作。总参作战部是杨成武副总长分管的单位，首长和杨副总长是老战友，交情深，总参作战部领导也都知道，这点面子他们会给的。你不去北京，你老弟帮我一把，先把我的位子顶上，你也不需要试用，你来了我就可以走人。我知道你不想再干秘书，这好办，我和项副主任讲好，请她尽快找人，这你可以放心。”

我感到他讲得有理，同意了他这个方案，于是第三次给黄永胜当了秘书。

大约黄永胜和项辉方也感到我这个秘书确实“老”了，不便久留，或者是于贯文走前的意见起了作用，我上任不到半年便从军区干部部又选调了一位秘书。1966年1月，一纸命令宣布我改任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后改称处）副科长。

这就是13年间我三进三出于黄永胜之门的背景和经过。我写这些，是想说明两点：第一，先后3次给黄永胜当秘书，内情不过如此，其中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第二，我在13年间断断续续先后3次给黄永胜当秘书，加上我当作战参谋期间同他也有不少接触，还有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年间，我作为他参谋班子中的成员，这为我全面观察、了解黄永胜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条件，我可以或者说有责任就他的为人以及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表现，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我看黄永胜

1953年5月，我的老首长王振乾同我谈他对黄永胜的印象时，用了“洒脱”二字。不少人觉得这两个字很雅，其实在北方、特别是在山东、东北一带，这是大白话，它有豪放、自然，做事干脆、利索等意。经我长期观察，我认为王振乾这一高度概括的评语是比较贴切的。

黄永胜不是过去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农干部。他是受过旧式启蒙教育的。他爱学习、喜看书、好思考，比较能接受新鲜事物。他能从一个普通战士很快脱颖而出，担任高级指挥员后又屡建战功，受到林彪、罗荣桓的钟爱，他的勤奋好学是一个重要因素。

他的老部下、曾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的萧元礼说，早年在中央苏区作战或打土豪时弄到书籍，黄永胜都不放过，看中的他就留下，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类小说，都是他在这一时期看的。他记性好，看了能记住，又喜欢讲，闲暇时间经常有些干部、战士围着他，听他“讲古”。这也是他和下级关系融洽的一个表现。

黄永胜在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在中央全会上讲话经常谈古论今，引经据典，黄永胜每遇不甚明了的成语典故，都要叫我标明出处，弄清原意。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学习海瑞精神，一散会黄永胜便到南京路一家古书店去搜购有关海瑞的书籍。他虽未经过系统的文史知识学习，但通过工作中这种点滴积累，所得也很可观。

战争年代，黄永胜不畏强敌，多谋善断敢打，特别是在东北战场，1947年的秋季攻势中，他在兵力不占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两战杨杖子，歼敌3个师；在辽西会战中，他率部昼夜疾进，在最后一刻抓住国民党军最精锐的第9兵团主力，为取得辽沈战役的全胜做出决定性贡献。

在和平时期，他在工作中也不甘人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南京举行过一次全军军事技能比赛，一位副参谋长担任广州军区领队。比赛结果，在十几个大单位中，广州军区名列第三。这位副参谋长回到广州后面带喜色向黄永胜报告参赛情况，不料却挨了批评：得个第三也值得高兴！黄永胜认为，解放战争时期，四野部队出尽了风头，创造了多少个第一！广州军区是四野的老底子，现在军事技能弄个第三，这是倒退，要赶快找差距，急起直追！为了提高军区部队的军事素质，黄永胜特别重视对干部的培训。1962年5月和1963年2月，黄永胜亲自主持了在衡阳车江139师和粤东123师驻地举办的军、师、团三级干部集训。车江集训时，参训干部按连队编组，军长当排长，师长当班长，黄永胜当连长。他不但言传，还亲自做各种单兵战术示范动作，“大首长做小科目”，一时成为美谈。

黄永胜重视人才。过去战争年代，谁有本事谁出头，谁也没话说。和平时期，特别是1955年授衔之后，论资排辈逐渐成风，不少资历浅的人才受到压抑。黄永胜对这种新出现的而且颇有些理直气壮的腐败现象很反感，并有不少抵制行动。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部）俗称一处，是司令部的核心部门，黄永胜用了一位“三八式”的上校当处长，却让一位红军时期的大校当副处长。军区炮兵司令部是军级单位，司令员孙干卿是抗战初期入伍的大校，而一位早期的红军少将却当了他的副手。这种用人不拘一格的做法全军罕见。有人说：“也就是黄司令敢这么干！”黄永胜曾参加过北伐军，以后参加秋收起义跟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也算是个“老资格”。但是，他并没有以此作为自傲的资本，嫉贤妒能。与黄永胜同属中央红军的刘亚楼和杨成武，入伍时间都比他晚，年龄也比他小，但是两人的职位很快便赶上了他，刘亚楼还多次成为他的顶头上司，而他对两人都很敬重，彼此交谊很深，这也可说是惺惺惜惺惺吧。但是，被黄永胜看“扁”了的人，要想改变他的印象就难了。

我不知道黄永胜如何评价我的工作。我三次离开他那里时，他都没讲，自然我也不问。但据我看，他对我未必十分满意。就我感觉到的，我入伍后虽也经过

一些磨练，但总有一些小知识分子的清高习气，常常放不下架子，拉不下面子，反映在工作上，我认为不属我职责之内的事，就一概不干。又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党政军机关的舞风甚盛，广东省交际处的周末舞会尤为有名。黄永胜极爱跳舞，但我对这项活动却有一些负面看法，因而我从不主动为他打听和报告舞会消息，他不会没有感觉。但总体上讲，他对我还是体谅大度的。秘书工作经常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不可能不出纰漏，黄永胜又是个急性子人，但遇到这种情况，他也只是指出问题，从未有过疾言厉色的批评责难。黄永胜常爱讲的一句话是：好鼓不用重槌敲。我自然也不甘当破鼓。

文革考验

1967年初，广州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不到半年，省、市党政机关便彻底瘫痪，社会大乱，革、保两派已经形成，而且壁垒分明。

毛泽东决定广东于3月15日实行军管，黄永胜出任省军管会主任。他从未做过地方工作，广东又是个经济、政治、人文大省，他深感这副担子难挑。

对地方实行军管，就得了解地方情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根据黄永胜、刘兴元的指示，由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兼省军管会办公室主任李维英负责，以司令部办公室的干部为主，组织了一个十多人的小班子，负责搜集和向上反映广东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随时向军区领导提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建议。当时我兼任省军管会办公室副主任，也是这个小班子的成员之一。因为这个临时机构的办公室房号为19，于是大家习惯称之为19号办公室。毛泽东指示军队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可是谁是真正的革命左派，谁是“保守派”（实际是不叫右派的右派），大家则有不同认识，上面也没有明确标准。但是，以江青为核心、实际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很快便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明确表态：以广州“三面红旗”（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广州医学院红旗）为核心的群众组织为“革命造反派”，即革命左派，军队应全力支持此派；而作为“造反派”对立面的则是“保守派”。由于各“造反派”组织多以红旗命名，于是这一派通称旗派；而另一派则因拥护军管，认为军管后全省一度东风浩荡，则被称为东风派，也称拥军派。

对广州的两派应该支持哪一派？19号办公室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中央文

革小组明确要求支持“造反派”，军区不能违抗，但是，“造反派”毕竟是少数派，他们造反劲头很大，却不是工农业生产的主力，倘若因支持“造反派”而得罪了多数派，或者像上海那样，进而镇压多数派，势必天下大乱，贻患无穷。毛泽东过去不是也说“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吗？据此，我们提出了“一碗水端平”和“支左不支派”的方针，黄永胜、刘兴元等军区领导都表示赞同。

当年4月中旬，周恩来来到广州。在4月18日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上，周恩来按照中央文革小组定的调子，明确宣布旗派是“革命造反派”，而东风派则是“偏于保守的群众组织”。这一定性，无异于宣判东风派的政治死刑。旗派代表无不兴高采烈，而东风派的代表们或垂头丧气，或愤愤不平。会议结束时，东风派几个头头围住黄永胜，说他们回去无法向群众交代，他们认为周恩来的这个表态与军区有很大关系，要求军区指出，他们究竟“保”在哪里，他们“保”了哪个“走资派”？黄永胜好歹劝走了这几个代表，然后向周恩来讲了他对形势发展的忧虑。周恩来沉默不语。

周恩来于19日凌晨飞返北京。未曾料想，当天晚间总理办公室秘书周家鼎突然打来电话，说周恩来指示对他关于东风派评价的一段讲话进行修改，将“偏于保守的群众组织”改为“革命组织”，“不能称为大老保”！这是对东风派评价的重大修改，“革命组织”的地位虽比不上“革命造反派”，但它毕竟不是保守组织，不能将它压垮、吃掉。消息迅速传出，军区领导和支左人员受到极大鼓舞，吃了一颗定心丸；东风派群众也得到不小安慰；而旗派一些头头则深感沮丧，他们知道军区实际上是同情、支持东风派的，如今又有了周恩来的这个挡箭牌，他们想一派掌权的美梦很难实现了。

周恩来当时的处境极为艰难，他能如此表态，实属不易，倘若没有事先征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他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

周恩来的新指示也让黄永胜增强了团结两派群众，减少社会动乱，创造“支左”新经验的信心。从5月12日至6月12日，他先后与两派12个较大的群众组织头头和骨干举行座谈，听取他们对军区“支左”工作的意见，也对他们提出建议和希望。他要求旗派讲政策，把握斗争大方向，加强与东风派的沟通，不要唯我独革；他鼓励东风派通过“革命大批判”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争取早日甩掉偏于保守的帽子，与旗派实现“革命大联合”。同广东周围各省、区以及全国形势相比，广州市以及广东全省，这一时段没有发生大的动乱。还有个有趣情况：东风派虽然不为中央文革小组所支持，但是，他们的组织非但没有萎缩，反而又有发展。

7月上旬，黄永胜带着一批反映东风派在周恩来指示后如何取得明显进步的材料，又带上参谋长阎仲川做助手，满怀信心地进京，要申请为东风派摘掉“保守”的“帽子”。7月10日下午，周恩来、叶剑英、戚本禹、叶群在京西宾馆第三会议室听取黄永胜、阎仲川的汇报。汇报材料很充分，黄、阎讲得也挺不错。汇报刚一结束，叶剑英便站起来，右手一挥：“摘帽喽！我看可以。”还没等周恩来表态，戚本禹赶紧发话：“总理，我看是不是还按你4月份在广州讲的，暂时不变，再考验他们一下？”周恩来明白，戚本禹讲的绝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个态不是可以轻易表的。他沉默片刻，然后望着黄永胜说：“我看这样吧，你们可以说，我听到他们有了很大进步感到高兴，希望他们不要自满，继续努力，对他们还要再看一段时间。”

冷水浇头。几个月的努力付之东流。但是黄永胜仍不甘心，他叫阎仲川先回广州，他则留在北京，想再看看形势，继续争取。然而，霹雳一声，来了个武汉“七二〇事件”！当他看到如同丧家之犬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他的同伴们在宾馆东躲西藏的狼狈相，看到“造反派”可以对重兵防护的京西宾馆肆无忌惮地轮番冲击，抓“陈大麻子”，抓一切他们想抓的人，他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感到阵阵悲凉。与此同时，他又从杨成武私下借给他的“文革内参”材料中，看到中央文革记者站派到广州的记者们写的许多攻击广州军区的报道。在他们的笔下，广州军区非但不“支左”，反而成了镇压革命左派、支持保守派的顽固堡垒。黄永胜不能不想，这些所谓记者都是有来头的，他们写的这些东西，肯定会引起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视。现在武汉军区的领导班子垮了，中央文革小组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下一步会整谁呢？

8月上旬，军区党委常委接到黄永胜的电话，说他对下一步的“支左”工作有些重要想法，不便于在电话上讲，请常委派个人到北京听他面谈，然后研究一下，看看该怎么办。常委指定我去北京。我于13日乘飞机赶到北京。次日，黄永胜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结束时，他说还要再谈一次，随即匆匆外出。我

在北京的几天，见他频繁外出，估计他是找一些尚未倒台的战友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据我所知，他去得最勤的地方是杨成武家，杨那时正受到毛泽东的信任。

两天之后，黄永胜同我进行了二次谈话。黄永胜本来是个爽朗乐观的人，但这两次同我谈话时，他却是双眉紧锁，忧心忡忡，情绪坏极。这种情况过去我从未见过。两次谈话，他主要讲了对文化大革命发展趋势的看法以及军区今后在广州“支左”的策略。他认为，过去我们把问题看简单了，我们的想法跟上面格格不入，根本行不通！胳膊拧不过大腿。保守派人多，听话，拥护军队，拥护共产党，运动中反而受压，确实叫人同情。但是，我们越同情他们，他们就同军队靠得越紧，“造反派”就越反感，反对军队，两派关系也越紧张，最后就出现武汉这样的事件。要知道，上面是站在“造反派”这一边的。出了事情，倒霉的是保守派的广大群众。“你看看，武汉的‘百万雄师’现在被打成了反动组织，被‘造反派’打得无处躲藏，死了多少人哪（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披露：湖北全省所谓各保守群众组织，在“七二〇事件”中，共死伤 18.4 万人。见该书第三卷 298 页。——笔者）！四川的‘产业军’也是这样，真好惨哪！”那怎么办呢？他严肃、痛苦、无可奈何地说：“我们过去的做法不能继续下去了！要当机立断，把‘屁股’掉过来，和多数派脱钩。这个决心很难下，感情上过不去，而且只要军队不支持，他们的组织可能要垮掉。但是，这总比被打成反动组织强。要赶快行动，我们不能既毁了自己，又害了那些拥护我们的群众。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讲了掉“屁股”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他说这些都是细枝末节，迟则生变，不能再犹豫了。

8 月 18 日我回到广州，向常委原原本本地汇报了黄永胜的意见。我讲完后会场一片沉寂，大家面面相觑，最后都把目光集中在刘兴元的身上，请刘拿主意。刘兴元沉思片刻后表示：大势所趋，不掉“屁股”是不行了。但是，现在“支左”干部都毫无思想准备，弯子不能转得太急，急了势必出事，欲速则不达。还是要先从做通“支左”干部的思想工作入手，既抓紧，又不轻率，才能尽量减少损失。大家都同意刘兴元的意见。

然而怪事来了。从 8 月底之后，在全国并未见中央文革小组借“七二〇事件”对“保守派”乘胜大举扫荡；而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广州两派在北京进行的谈判，

旗派挨批的事儿却逐渐多了。10月初，终于传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受欢迎的一条“最新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于是人们恍然大悟。这条“最高指示”真好，它一下子从根本上解决了两派你死我活的纷争，解除了“造反派”的主体地位和特权。若是早有这条指示该多好啊，可以少死多少人、减少多少损失啊！看来毛泽东也在“七二〇事件”中受到了启示，看到了众怒难犯，看到“造反派”实在不得人心，靠“造反派”成不了大事。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灾难。最高领导人的出发点和一切方针、政策全错了，作为一个地方或一个大单位的负责人，只要参与这场运动，就绝无功绩可言，能够不避风险，采取一些消极抵制措施，减少一些损失，已属不错了。黄永胜在“支左”工作中是兢兢业业，想方设法争取减少一些损失。广东大规模武斗比周围各省、区以至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来得要晚，伤亡也少；工农业生产破坏较轻；两派之间对立不算尖锐，派性消除较早；“解放干部”工作走在全国最前列；革委会成立后没有出现大的反复。这些情况有目共睹，周恩来曾多次表彰。有人说，黄永胜如果坚持到底，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不提出掉“屁股”的意见就好了。倘若时光能够倒流到1967年7、8月间那个无法无天的岁月，不管让谁坐到黄永胜的位置上，感受大概就不一样了。

1974年7月，在丁盛调离广州之后，接替丁盛担任了广东省委第一把手的赵紫阳一次作“批林”报告，说黄永胜掉“屁股”是一个阴谋，是想“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赵紫阳这样高智商的政治家，竟然说出如此不近情理、逻辑混乱的话来，实在令人惊讶。试问：黄永胜把自己管辖的地方弄乱，让两派互相残杀，能从中捞到什么油水？但愿这是他在政治高压之下讲的违心话。

不识时务亦俊杰

1968年3月23日，周恩来亲自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和随之派来的一架军用运输专机，把黄永胜召到北京。周恩来派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把黄直接接到人民大会堂。在车上，吴法宪对满腹狐疑的黄永胜守口如瓶。当他见到周恩来，接着又见到被押进来的垂头丧气的杨成武，得知已决定由他来接替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杨成武还有个“代”字）时，他的心里真如同打翻了五味瓶。这位半年前还红

得发紫的老战友，怎么说倒就倒而且又由他来接手呢？几任总参谋长，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像他这样直来直去的人，这个位子能坐稳吗……他不假思索地向周恩来提出，自己的水平有限，难以胜任，坚辞不就。周恩来鼓励他要勇挑重担，并表示他对黄的请求无能为力。黄永胜又随叶群去见林彪，林彪拿出了毛泽东的批件，黄永胜看后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再推辞就是向伟大领袖讲价钱了。他只能坚决服从命令。

上台工作不久，黄永胜就发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不只关心“样板戏”和文化大革命，他原以为军事工作与文化大革命是两条线，却不料江青对军队也很感兴趣，黄永胜尤其对她插手北京卫戍区的工作极为反感。北京卫戍区主要担负中央机关和北京地区的安全警卫任务，名义上它是北京军区的下属单位，实则很多工作都由军委和总部直接领导，其地位极为重要。黄永胜批评、制止了卫戍区个别领导人擅自向江青汇报工作的错误行动，江青心中自然不快，于是，不久便发生了江青向黄永胜示威的事件：一份关于文化工作呈报黄永胜、江青的文件，经办机构先报送黄永胜处，黄看后画了个圈，再送江青。本来送文程序未必反映官职大小，有时有拍板权的反而排在最后。江青这次主要是心气不顺，借题发挥。她看后怒气冲冲地写下批语：竟夺我的权，他已看过，再给他看看！她唯恐黄永胜还看不明白，又画了个箭头，直指“永胜”。文件又回到黄永胜手上，他看了一眼，便往桌上一丢，满不在乎地说：“我不懂文艺，也不管这事儿，夺她什么权！”

这年 11 月，江青又向黄永胜发动了一次猛烈进攻。11 月 28 日是阿尔巴尼亚解放 34 周年纪念日。阿尔巴尼亚是当时中国在东欧的唯一盟友，中方很早便向阿方通报，将派以黄永胜为团长的代表团赴阿参加庆祝活动。江青却突然发难，说黄永胜没有资格当这个团长，要求换人。经过周恩来多方奔走劝说，最后又请示了毛泽东，总算维持原定人选不变。江青似乎是白闹腾了一场，但有心人都会思考：江青为什么胆敢如此无理取闹？

中共“九大”之后，江青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名副其实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气焰更盛，张春桥、姚文元成了她的左右臂膀；而军委办事组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黄永胜都是早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四人对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的认识高度一致，特别对江青飞扬跋扈的作风极为反感，因而在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双方壁垒分明，经常唇枪舌剑，由于毛泽东、林彪很少参加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常常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江青对周恩来的态度也极为恶劣，黄永胜等人为之忿忿不平。一次江青以谈工作为名，把黄、吴、李、邱等人召到她在钓鱼台的住处，对周恩来大加诋毁，希望黄、吴、李、邱等人站在她这一边。离开江青处之后，四人认为这是严重的非组织活动，立即报告了林彪，又在林彪的支持下，由黄永胜、吴法宪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却不料，毛泽东的态度非常暧昧，黄永胜深感失望。

黄永胜应该明白，反对江青的人都没好结果。早他两年从广州进京的陶铸，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曾是中国政坛第四号人物，但不到半年，就因为不愿受江青摆布，并当面顶撞江青，被江青轻易拉下马来。黄永胜与陶铸关系非同一般，陶铸的倒台，曾让黄永胜受到很大震动。现在他的处境与当年的陶铸颇为相似，他理应认真思考一下照此发展下去的后果。

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让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间掩盖已久的矛盾公开化。黄永胜原未参加这次会议，他在军队的地位、声望又在吴、李、邱等人之上，上面仍然对他寄予希望，于是紧急召他上山，个别启发诱导，却又不肯点破、交底，而是旁敲侧击，但用意甚明，希望他反戈一击，站到“革命路线”一边。黄永胜面临着个人命运前途的重大抉择。但是，黄永胜认为自己一颗赤心干革命，上无愧于党，下不作于人，党叫干啥就干啥，并不存在什么站错队的问题，他不愿意干违心事儿。他没有像上面希望的那样表态。他的表现让上面大失所望，自然将他纳入林彪集团。“九一三事件”之后，他受池鱼之殃，也就毫不奇怪了。

1971年9月24日，周恩来以开会为名，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召到人民大会堂，然后逮捕关押。这一天距黄永胜奉召进京整三年半，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中国有句名言：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原是古人对诸葛亮、庞统的赞誉之辞，以后逐渐变味。在中国的旧小说中，这是最常用的一句劝降的话。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句话成了一些风派人物朝秦暮楚随风转舵出卖灵魂的遮羞布。

有些比较了解北京政坛内幕情况的人曾认为，黄永胜这人过于任性，在人屋檐下，就要能低头。到了北京，就要适应北京的形势，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你和

她斗哪门子气？最后倒霉的还不是你！特别是在庐山，上面的态度已经很明朗了，眼看大祸临头，上面给了你最后一次脱身机会，你却执拗到底，最终闹个身败名裂，何苦来哉，实在是不识时务！

但是也有人持相反看法：共产党应当是讲民主的，可为什么在党内却会出现反民主的霸气而且逐渐坐大？就是因为许多人放弃原则、姑息纵容。倘若错误的东西刚一露头，大家就群起抵制、反对，它或可知难而退，反之，则你让一寸，它进一尺。这种事情，历史上屡见不鲜。黄永胜同江青所代表的霸气对抗，从力量对比来讲，黄永胜处于绝对劣势，失败固在意料之中。但是，第一，评论事物的成败得失，恐怕不能只看眼前，而要从长远、全局来看。1976年清明的天安门群众运动，当时遭到镇压，是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运动，成为半年后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基础。黄永胜的抗争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倘若人们日后回顾历史，发现当江青等人胡作非为之时，偌大一个“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竟然万马齐喑，那就太可哀了。第二，当江青一伙施虐之时，民众动辄以言获罪，不得不三缄其口，道路以目，而黄永胜说出了一些群众想说却不敢说的话，一些得知这一情况的人，是为黄永胜拍手叫好的。第三，黄永胜的言行，反映了他的性格、为人，倘若他也屈服于江青的淫威而装聋作哑，他就不是本来的黄永胜了。

受人崇敬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曾在一首小诗中赞颂项羽，称他为人杰、鬼雄，她“至今思项羽”。项羽是一个失败者，但李清照不以成败论英雄，她敬重的是项羽的人格。项羽在全军覆没之后，无颜见江东父老，选择了死。李清照认为这种人是有骨气的，可敬的。黄永胜在面临绝境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却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不知当时他是怎样想的？这又是不识时务吗？

对黄永胜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究竟何是何非？还是让历史老人去评说吧！

不尽的困惑

“九一三事件”之后，黄永胜以及他的亲密伙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被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先是称“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投入牢狱。这原在意料之中。江青、张春桥等人与他们积怨极深，岂能饶过他们！

5年之后，失去了后台的“四人帮”倒台。毛泽东曾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四人帮”当然是敌人，而打倒“四人帮”者又声称是要坚决维

护毛泽东思想的，照此逻辑，人们曾期望原来主要由“四人帮”掌控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案子，有可能重新予以审议。却不料，后来者不但对“人犯”照单全收，而且管控更加严苛；同时对“四人帮”加给他们的诸多罪名也一概继承；特别是居然能把两个明争暗斗多年、水火不相容的政治集团捏到一起，把他们说成是“一伙的”，然后一锅煮，真是匪夷所思，令人拍案叫绝。

根据中共中央（且不管它后面是谁在掌权）在“九一三”之后公布的材料，林彪可谓阴险毒辣、罪行累累，而其最令人惊心动魄的莫过于“策动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阴谋失败后，又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黄永胜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二号人物，自然会参加这些阴谋活动。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的黄永胜五大罪状中，竟无一条与林彪的上述罪行有关！人们不能不怀疑，黄永胜到底有没有资格担当“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把手？他倒像是侯宝林相声段子中那个外行跑龙套的。

林彪发动武装政变最重要的罪证，是他的一个手令和写给黄永胜的一张便条。手令可以理解为写给林彪集团各主要成员的，黄永胜自然有份儿，而便条则是专门写给黄永胜的。但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样两份至关紧要的材料，黄永胜在“九一三”之前竟然没有看到！手握军权的黄永胜在武装政变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有人挖苦林立果搞政变像小孩子过家家，看来林彪在这方面也不比他儿子高明。

林彪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自然要有一批文臣武将，黄、吴、李、邱等人是少不了的。但是，这四个人对此竟然一无所知！特别法庭也不得不确认这四人确不知情。这着实令人尴尬。难道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这一家三口再加上周宇驰、王飞等几个无名之辈，就可以另立一个中央吗？

在黄永胜的五大罪状中,第一条就是他“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撤消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彭德怀元帅对中国革命功高盖世，无论谁迫害这位革命元勋，都该严加惩处。但是，看了对黄永胜的这些指控，人们马上会产生许多疑问：上述对彭德怀的处理意见，是由“彭德怀专案组”提出来的，那么，这个专案组是自行作主还是根据什么人的指示提出这些意见来的呢？专案组的意见

不会只送黄永胜一人，其他人又是什么态度？有没有也同意专案组意见的或者反对专案组意见的呢？由此不能不令人想起另一件公案：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也是专案组提出：“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建议“撤消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在表决时，除一位女中央委员装病没有举手外，到会的一百多人，其中包括许多功成名就的革命元勋、政治家，都一致举手通过，这与黄永胜的罪行又有什么区别，是否也应予以追究呢？又如，一位以告密为能事的上将军，在文化大革命初起时，他便向江青密报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在上海毛泽东和江青的住处安装窃听器；“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他诬告“二月逆流”的主将、革命元勋谭震林是叛徒；“杨、余、傅事件”发生前，他又给毛泽东、林彪报送材料，称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中曾被俘叛变，致使这三人都身陷囹圄。江青多次夸奖他“立了新功”，并要为他“记功”。就连对他有大恩的周恩来，他也没有放过，把国民党伪造的诬蔑周恩来是叛徒的《伍豪启事》密报江青，给后来得悉此事的周恩来造成很大精神压力，直至周逝世前3个多月最后一次进手术室前，还叫工作人员找来他就此事的辩诬材料，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此情此景，怎不令人悲愤填膺！然而，这位上将军却一直大红大紫，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黄永胜的其他几条罪状，也都存在着类似的一些“看不懂”的遗憾。

1981年，我在军事学院（即后来的国防大学）学习。我所在队的队长姓王，他与学员们的资历都差不多，课余时间大家经常一起闲聊。这位队长曾作为军事学院的代表旁听了“两案”审判。一次，他谈起了旁听印象。讲到黄永胜，他说：“黄永胜不要律师为他辩护，他自己讲了足有3个钟头。你别看这老家伙70多岁了，头脑可一点儿也不糊涂，有些事儿讲得还挺有道道咧！”他当时讲话的表情和口气，不像把黄永胜当成反革命分子。“两案”审判时，电视台只转播了经过精选的部分画面，被告人自我辩护或律师辩护的情况都没转播。当时的报纸，在报道黄永胜的受审情况时，只讲到 he 最后念了两句诗：惟有赭衣供疾病，不曾涓埃答人民。如果不了解、不联系他前面的长篇发言，只能解释为他在参加了林彪集团的种种罪恶活动之后，现在痛悔、惭愧、认罪。但是，也有些颇有来历的材料说，黄永胜在被捕后，顽固，狡猾，拒不认罪。窃以为，“九一三事件”发

生至今已经近 40 年，“两案”审判已过去 30 年，黄永胜去世也已 27 年有余，他的自我辩护词似可公开或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如果他讲得确有道理，或讲出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真相，正可以史为鉴；即使他确属狡辩，那也不怕，可以当“反面教材”教育群众，毛泽东讲过，毒草锄掉可以做肥料嘛！

不久前，一位朋友问我：网上有黄永胜的一些材料，看不看？我问是哪一方面的？答曰生活作风方面的。我说，这类材料，过去我看过一些，现在不想看了。

“为什么呢？”朋友很认真地问。

我说：“很简单，第一，这些材料很多都是添油加醋甚至捕风捉影的东西，哗众取宠，很没意思；第二，黄永胜并不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打倒的，回避他该不该打倒的根本问题，却在生活作风问题上大做文章，岂不是舍本逐末、顾左右而言他？第三，黄永胜在生活作风方面确有人所诟病处，但是，有些掌管他生死簿的人，在这方面的问题比他多得多，严重得多！我不反对甚至拥护将生活作风作为考核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一项标准，但应该一视同仁，要查就从上到下认真查起，不能双重标准，为尊者讳；不应把倒台的干部不分青红皂白都当落水狗打，揭老底儿，而把得势者个个打扮成头罩光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

再讲要跑题了，打住。

2010 年 9 月 23 日于广州

本文为《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附录四。本刊发表的是作者提供的原稿。

【史林一叶】

[也谈维特克访华与江青](#)

[丁凯文](#)

美国学者罗克姗·维特克女士（Roxane Witke）1972 年夏访华并见到江青一事，在文革当中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是由于当事人江青在 1976 年 10 月被打倒，在 1977 年揭批“四人帮”反党罪行时，江青曾于 1972 年 8 月会见维

特克女士一事也被渲染成“江青里通外国，卖国求名”，在 1977 年的中发 [1977] 37 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转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



罪证（材料之三）》的通知及附件》里，江青被指责为“抗拒周总理的指示，私自同维特克谈话七次，长达六十小时。她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肆意编造历史，美化自己，贬低和诽谤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她大量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奉送重要军事地图和机密资料，里通外国，卖国求名。”而作为历史学者的维特克女士因对江青的访谈，无端卷入这场中共自己的党内斗争，糟了池鱼之

殃，日后更由于坊间所传言的《红都女皇》一书，维特克本人被张冠李戴，成为传言之中心人物，“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一幅漫画中，江青被描绘成用“党和国家的机密”无耻地换取维特克赐予的“红都女皇”的桂冠。近几年来已有文革史家余汝信撰写两篇文章深入探讨这一事件（余汝信《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见枫华园电子杂志第 448 期，2004 年 4 月 30 日，还见“林彪·军队·文革”网站“余汝信文集”；余汝信《新瓶里的旧酒——新书〈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的旧思维〉》，见《记忆》电子杂志第 6 期，2008 年 10 月 30 日，还见《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第 677 期，2008 年 11 月 18 日）然而，国内出版的有关书刊、文章鲜少对维特克女士做客观、公正的评论。有感于此，笔者愿就此事谈些个人的看法，就教于方家。

（上图：当年的一幅漫画。）

一、中共领导人和中央文件等对维特克的评论

笔者见到的中共领导人讲话中最早谈及维特克访华一事的是华国锋。1976 年 10 月 7 日，也就是华国锋主导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华国锋在接见山东、湖北、江苏、上海和南京、济南、武汉部队的领导人时发表了讲话。华国锋在讲话中称：“美国记者维特克，是情报局的，江青和她谈话，把中央很多东西传出

去，讲了很多下流的话，对毛主席有很大的污蔑。”（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 2006 年版）

1976 年 10 月 12 日接见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等人时，华国锋又说：“江青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谈话，谈了六次，贬低主席，内容下流。‘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华国锋的这次谈话不再称维特克女士“是情报局”的，将这顶“特务”帽子从维特克头上摘了下来，尽管称维特克是“作家”，仍然不能算准确。这里华国锋所言的“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看来并未成功实施，但仍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为了坐实江青“里通外国、卖国求名”，中共中央在 1977 年 9 月 23 日下发了 37 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转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的通知及附件》，文件中罗列了“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新华社揭发姚文元利用职权掩盖江青里通外国的罪行”和“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的揭发交代”。其中“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最具爆炸性：“江青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认为这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里通外国、投降帝国主义的大好机会，无视周总理批示，在北京一次就见了六个小时。”“周总理指出：维来华后期表现不好，思想反动，来历又未弄清，要江青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江青听了接待人员转达周总理的指示后，大发雷霆，叫嚷：‘我的事不用你们管！’‘你们胆子真大，敢来围攻我！’她一意孤行，又同维谈了六次，连同前一次共谈了六十小时。”“江青为了掩盖她里通外国的罪行，伙同王洪文强令收缴有关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材料，销毁罪证。”事实上，维特克女士是得到中国方面的邀请访华而见到一些中国妇女界领导人，如邓颖超、康克清，经过周恩来的批准与安排乃至最终见到江青，未知何以周恩来称维特克“来华后期表现不好，思想反动，来历又未弄清”。张清化的揭发则称，江青“谈完后，当场即将《解放战争开始前形势图》、《我军战略反攻形势图》、《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图》、《西北战场作战过程形势图》、《辽沈战役概况图》、《平津战役概况图》、《淮海战役概况图》和《解放战争三年半战绩统计表》等重

要图表，拱手送给了维特克。”“以上图表的内容大部份是我们没有公开的。江青里通外国，出卖了大量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

此后国内出版的相关回忆录，如张颖的《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张颖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负责陪同江青会见维特克），邬吉成、王凡的《红色警卫》等书对此大都口径一致，沿袭了中共中央的定论。比如，《红色警卫》一书说：“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她（指江青）竟然置组织纪律于不顾，泄露了大量党内的机密。她把政治、军事、外交、人事、资源等多方面的重要情况告诉维特克，还把一些机密的作战地图和照片，送给维特克。”（邬吉成、王凡《红色警卫》，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3 年版 211 页）大陆作家叶永烈说得更直白：“她（指维特克）访华的真正采访目标，是江青。”“也真巧，维特克希望访问江青，而江青把她看作是自己的‘斯诺’——一方有所求，一方有所需，也就一拍即合。”（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下卷，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 年 1 月版 1116 - 1117 页）

以上情况表明，中共中央高层虽然未必认定维特克女士真的负有某种特殊使命，但是由于江青是被打倒的“反党、反革命集团”首犯，因此江青对维特克的谈话也要上纲上线，冠以“里通外国”、“泄露国家机密”的大帽子，而维特克本人则被动地成为江青“里通外国”和接受中国“国家机密”的承受人，也许这就是为何中央文件要借周恩来之口说“维来华后期表现不好，思想反动，来历又未弄清”。可笑的是，既然周恩来认为维特克“来历又未弄清”，何以当初主动建议江青与其会见呢？而大陆的作家们，仅仅因为维特克与江青的几次谈话被中共中央点名，就将其纳入“另类”，事事都要从反面加以诠释，不亦悲乎？

二、维特克女士对中国的研究

维特克女士本科就读于加州的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维特克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现代中国在五四时期对妇女态度的转变》（*Transformation of Attitudes Towards Women During The May Fourth Era of Modern China*）。值得一提的是，维特克就读的这三所学校都是美国顶尖的大学，在学术上均享有盛誉。此后维特克在美国一些大学的学术

机构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如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等。维特克的研究范围着重于近代革命的中国和当代中国社会，也为美国国务院就中国事务提供咨询，并参与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会。维特克女士在“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亚洲研究期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以及“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发表多篇文章。例如，维特克在1967年《中国季刊》上发表了《五四时期的毛泽东、妇女与自杀》(*Mao Tse-tung, Women and Suicide in the May Fourth Era*)，1979年2月维特克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文化革命之后的中国》(*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维特克女士专注于中国妇女的专题研究，与 Robert Riden 合作著有《红旗飘飘：“红旗飘飘”文集指南》(*The Red Flag Waves: A Guide to the Hung-chi piao piao Collection*)，1968年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与 Margery Wolf 合编《中国社会中的妇女》(*Women in Chinese Society*)，1975年12月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维特克在访问中国前是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历史系的副教授。

这里顺带一提的是，大陆作家叶永烈否认维特克是副教授，叶说：“当时中国报纸称她是副教授，实际上她只是‘助教授’”(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下卷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年1月版 1113页)。这是叶永烈对美国学校教职缺乏了解之故。美国大学的教职分三级：“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和教授(professor)。拿到副教授相当于有了终身教职，学校如非有特殊原因不能随意解聘。而维特克当时就是该校的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笔者从以上搜集到的不完全资料来看，维特克教授是长期研究中国现代历史，尤其是有关中国妇女问题研究的严肃、严谨的美国学者。正是由于对中国现代历史和妇女问题的研究，维特克期望亲自走访中国，实地观察、了解乃至访问中国和中国妇女领导人，这就是维特克1972年访华的初衷。维特克在纽约通过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交往，获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在1972年夏“以个人的名义”访问中国，对外友协则承担维特克在中国期间的所有费用。(罗克姗·维特克《江青同志》(*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年出版，英文版19页)

三、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

综合张颖的《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杨银禄《我所知道的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和维特克本人所著《江青同志》一书，兹将维特克与江青谈话的大致经过罗列如下：

(1) 维特克到中国后向负责接待的对外友协提出希望采访的人员名单，包括时任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在与一些历史学家、医生和艺术家的访谈之后，维特克见到了邓颖超和康克清这两位中国妇女界的元老。中国对外友协还向周恩来呈报了维特克希望见到江青的请求，周恩来在对外友协的呈文上作了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20 页）江青看到邓颖超、康克清会见维特克的简报，又见到周恩来的批示后说：“一位政治家如果想在国内有牢固的政治地位，没有国际舆论的支持是不行的。”江青提出要见维特克，并请周恩来负责安排接见事宜。（杨银禄《我所知道的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见《党史博览》2010 年第 10 期）

杨银禄认为“一位普普通通的美国公民，受到这样高规格的接待和会见，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是，她（指维特克）想得到‘中国问题专家’的称号，便提出了会见江青的要求。”（同上）杨银禄此言对维特克颇有贬义，显然有失公允。维特克作为研究中国妇女运动的学者，受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访华，当然期望认识、了解更多的中国妇女界领导人，包括江青在内。但是江青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不容易见到，期望得到江青接见应属奢求，维特克自己开始也不抱过高的期望。维特克回忆说：“下榻北京饭店后不久，我被要求起草一份旅行计划，提交一份我想采访的人的名单。旅行计划比较简单，列出一些主要的景点和城市，而我列出的采访对象有预期可以见得到的和一些看起来不可能见到的人，其中也包括本书的主人公，那不过是出于对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和革命文化的权威形式上的敬意。那时我没有抱任何希望，而且因为她令人生畏的声望，我也没有指望要见到她。”（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 22 页）安排江青会

见维特克是周恩来主动为之。杨银禄揣测维特克求见江青的动机是“想得到‘中国问题专家’的称号”纯属臆测，并无事实根据。叶永烈更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说：“维特克来中国了解现代妇女运动，所获甚少，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热烈的握手，表明写作江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得成功。”（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下卷 1117 - 1118 页）不知叶永烈有何事实和证据证明维特克“所获甚少”，又有何证据证明维特克“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叶永烈将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贬斥为“一拍即合”纯属毫无道理的偏见。

（2）张颖指称江青在谈话中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你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 30 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23 - 24 页）杨银禄的文章则与张颖的回忆大致雷同。其实，无论是张颖的回忆还是杨银禄的回忆，都是 1977 年下发的 37 号文件的翻版，该文件里的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揭发材料就称“江青与维一见面，就要维为她写传记。她对维说，‘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我谈的都可以发表’，‘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能走斯诺的道路’。”（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2006 年版）众所周知，中共为了达到批倒批臭自己对手的政治目的，这类由中央下发的揭批材料的可信度和真实性都极低。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人们仍然不加分辨地予以引用，难免不被误导。

维特克书中则完全没有这一情节。维特克记述说：“她（指江青）转到另外一个话题，她说周总理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建议她应该接见哪些外国客人。当埃德加·斯诺的夫人路易斯·维拉·斯诺 1970 年 9 月来北京访问的时候，为她安排了一次接风，当时时间短促，江青正在家中小酌，即被召集参加。由于事先没有通知到，她一时不知道应该送给尊贵的客人一份什么样的合适礼物。而在斯诺夫人这一边，也被搞得一团糟，结果意外地把本来准备送给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礼物送给了江青！‘你见过斯诺夫妇吗？’她问道。虽然曾经读过很多斯诺写的

书和文章，我没有见过他们，对于他的作品我们只聊了几句。然而，我和我的前妻尼姆·韦尔斯有联系，她曾经在 1930 年代末期采访过中国的女性革命领导人。

‘他现在的妻子对中国也非常友好。如果你见到她，请转达我对她和她的家人的问候以及欢迎她再次来访。你成为中国的朋友后，你也可以经常来看看我们。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接待你。’”（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 29 页）江青如果当场要求维特克为自己写书出传记，维特克应该不会遗漏。维特克是根据自己的记录和中方提供的记录稿所撰，在 1977 年出版《江青同志》一书，据 1972 年不过仅仅 4、5 年而已，而张颖的回忆却是在 25 年之后的 1997 年问世。此外，笔者在 2010 年 11 月感恩节前后，设法联系上住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维特克女士，向她求证这一情节。维特克向笔者证实江青在谈话中从未要求维特克为自己撰写一部传记。由此可见，张颖的回忆确有事后丑化、脸谱化江青之嫌。

（3）江青主动安排在广州继续与维特克的谈话。在北京与江青谈话后，维特克又与邓颖超等其他妇女界领导人会谈了四天，在此期间，江青还不断派人带来江青的讲话、照片和一些艺术品。随后，维特克转去上海访问。维特克自己承认她并未期待能再次见到江青。8 月 24 日维特克在上海访问时，突然被告知江青要在广州再次与她见面。（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 34 - 37 页）8 月 25 日到 8 月 31 日，江青与维特克谈话进行了 7 天，每天谈一次，短则五六个小时，长则达八九个小时，加上第一次在北京的谈话，双方共谈了 60 多个小时。据张颖的回忆，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的主要内容涉及：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战争情况，江青意图说明她当时与毛泽东在一起，共同指挥了战斗；江青个人早年的革命经历和与毛泽东的婚姻，以及一些家庭情况；三十年代上海党组织与鲁迅相关的一些情况；中共建国后江青参与的一些文艺方面的工作，如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以及《红楼梦》评论等；建国后中共党的一系列重大活动以及党内斗争；江青自己搞的文艺革命，其中涉及京剧、话剧、电影、音乐、舞蹈、体育等。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内容广泛，涉及面很多，但张颖认为江青的谈话“没有逻辑、胡编滥造”，江青的目的是“有计划地为自己树碑立传”，江青“有些话故意说得不清不楚，这就可以让维特克去编造去发挥。”（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99 页）姑且不论江青的谈话是否“没有逻辑、

胡编乱造”，笔者认为，江青虽然不是一个有条理有才华的叙事者，她的谈话往往有些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但是张颖由此而认为这是江青故意让维特克去编造历史写故事，显然只是一种个人的臆测，也未免低估了维特克作为历史专业的专业素养。

关于广州谈话的内容，维特克在书中也作了较为详细的交代，如江青在上海的经历，特别是涉及“左联”以及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等。维特克特别强调江青力图给人一个坚定的革命家的印象，维特克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她（指江青）建议把她的生活经历放在革命这个大背景下。当一个人把革命经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任何个人的作用都显得微不足道。”维特克说：“我们谈话的模式都是从傍晚开始，持续了六天，间或休息时用些晚餐，然后继续我们的谈话，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有一次，我们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和当天下午还各进行了一次额外的谈话。这样，江青以这种君临天下的帝王般的无产阶级特色进行谈话，她经常兴致所至漫无边际地讲述她的革命经历。”（**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 41 - 42 页**）

如上所述，维特克在书中没有只言片语涉及江青明确要求维特克为自己写书的内容，且维特克也对笔者亲口予以否认。杨银禄却说：“在为维特克夫人送行时，江青说：‘希望早日看到你写的我的传记，预祝你成功！’”（**杨银禄《我所知道的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见《党史博览》2010年第10期）但是另一个当事人张颖的详尽回忆却没有这个内容。很难想象，江青会这么迫不及待地明确要求维特克为自己树碑立传，而当事人维特克对此竟然不置一词，置若罔闻。看来杨银禄的回忆也难免流于党文化的窠臼。

毛泽东在世时，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国家，西方世界常常用“铁幕”二字来形容共产国家。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仅仅是打破坚冰的开始，西方迫切地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中国也有同样的要求。江青同意接见维特克，当然有自己的打算，希望通过维特克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的一切，树立一个个人的“光辉形象”。西方学者从其自身的立场出发，一定会在访谈后发表自己的看法或出版自己的专著，根本无需中方人士刻意地提示，那样反而会弄巧成拙。江青也不至于笨到这种程度低三下四地恳求一个初次见面的外国人为自己树碑立传。站在维特克的角度

度，维特克的中国之行能得到江青接见，显然出乎意料，原先有关中国妇女的研究计划无形中被“江青”这个特殊的课题所取代，这也属正常。所以，维特克回美后撰写一部有关江青的书籍是件毋庸置疑之事，至于怎样撰写与何时出版则是维特克自己的事情，无需外人置喙。反倒是大陆的一些作家戴着有色眼镜刻意曲解维特克访华事件，以配合官方批判江青“篡党夺权的野心”。

中方人士的回忆与著述之所以存在某些严重的问题，关键在于人物的脸谱化，以官方的是非为是非。江青作为文革中的政治人物，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解析、研究，而非事事丑化。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是周恩来从中牵线搭桥，无论双方谈几次，都不能看成是江青的错误，即使江青心中希望维特克回美后写一本关于她的书籍，也谈不上是什么罪行。至于江青“出卖党和国家军事机密”也是子虚乌有。江青交给维特克的地图仅仅是毛泽东在 20 多年前在陕北的行动路线图，江青意在说明她是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唯一女性（江青在 1980 年代的“两案”审判中也曾在法庭上提及此事以质疑法庭的合法性）。站在维特克的立场，维特克与邓颖超和康克清的多次谈话从未见中国官方予以质疑或批判，为何与江青的谈话在“四人帮”倒台后就变得大逆不道？由此可见，谈话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与江青谈过话的海外人士并不少，如英国女作家韩素音），关键是维特克抵制了中国官方在事后的无理要求，引发了中国官方的不满，而韩素音这类对中国“友好的作家”处处迎合中国官方的宣传口径和需要，因此无论何时都是官方的座上宾。

根据张颖的回忆，“1972 年的岁末，周恩来总理又召集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周恩来只简单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163 页），且“当时保存在保密室的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记录材料，全部都被江青搬走了。”“江青不仅是取走了全部记录材料，并且全部烧毁了。”（同上，165 - 166 页）。杨银禄也说：“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我，问：‘江青同志跟维特克女士的谈话录音带有多少？’我回答：‘这些录音带是用装电影片子的铁桶装的，有两桶。’周总理又问：‘有人借走过吗？’我说：‘没有。我怕丢失，在广州上飞机以前就用密封条封好了，到现在密封条都没有撕掉。’周总理表扬说：‘那好，你办事还是蛮认真的。这些

录音带请你保存好，绝对不能丢失和外传。先放在你那里，如何处理，以后再说。如果有人要借，请你直接打电话给我，经我批准后方可。主席那里除外。’我说：‘请总理放心，坚决按照总理的指示办！’”（杨银禄《我所知道的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见《党史博览》2010年第10期）文革史家余汝信问得好：“问题是张颖称当年‘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江青把封存在外交部的所有记录材料都搬走，而且烧毁了。’那末，二十多年后‘实录’中这些谈话‘记录’又从何而来？凭过人的记忆还是凭想象？”（余汝信《新瓶里的旧酒——新书〈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的旧思维〉》）亦或是张颖违背组织原则私下保留了江、维谈话的记录稿？

四、维特克回美后的工作

根据张颖的回忆，维特克回美后，江青立即组织专人为她整理谈话内容，并请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审读，周恩来也确实阅读了江青谈话的第一部分，并作了适当的修改。张、姚二人对整理的谈话内容没有表态。周恩来此后召集曾参与会谈的外交部、对外友协人士开过几次会，对是否将整理稿送给维特克一事拿捏不定。后周恩来经请示毛泽东，所有录音带、会谈整理稿全部封存、归档，不许外泄，更不可能送给远在千里之外的维特克。（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154 - 163页）江青虽然权倾朝野，当初曾信誓旦旦地答应送给维特克录音带和记录稿，这次却在毛泽东和党的机器面前败下阵来。

维特克记述说：“在我1972年返回美国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通过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他的夫人何理良提供的外交渠道，江青和我互相交换了很多书籍和照片，两部故事片以及各种消息。然而那些余下的录音文稿的交付问题几个月后还是杳无音讯。我不时地收到传来的消息，说他们用两种语言（中文和英文，就像第一次那样）准备文稿工作量很大，但很快就会搞好。终于在1973年5月何理良代表大使和其他同志正式通知我，我和江青的谈话记录“过于冗长、很繁杂”，不宜作为有关党和政府的正式报道发表。她向我保证（她和大使在其他场合多次重复了这个指令），我可以自由出版第一份记录手稿（这份手稿与后来江青告诉

我的完整的经历密切相关)，也可以出版我自己的记录。但我最好不要写成一本‘传记’（这会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即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而非领袖创造历史，而且中共认为毛才是真理和智慧的唯一化身），要‘以毛主席的观点’撰写一部中国革命史，其中包含一章或两章有关江青的内容。”（**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 13 页**）

维特克显然不知道中国高层内部运作的机制与过程，当然对中方的食言自肥有些烦恼。维特克说：“除了第一份记录稿以外，后来的录音文稿都没有交给我，开始我还为此很烦恼，后来又觉得很好奇，因为我发现我面对的是中国领导人内部明显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人对我显得不太自然的热情中，我察觉到了细微的焦虑，我知道这只是复杂、深刻的分歧和裂痕的外在表现。仅仅阅读毛主席的总结讲话和指示，那些内幕不可能为中国的公众所知。但从长远来看，由于他们最终做出的不交给我江青谈话的官方版本的决定，使我有出版这本书的自由。这样我可以写下她说的话，外界的有关评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解读，而不仅仅是作为江青的传声筒。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是其中的一部分。例如，江青一直答应会把录音文稿交给我，而且我在中国之时她从未食言，难道是她自己突然改变决定不把文稿交给我吗？这个决定会不会是出自毛的指示？也许毛受到一些人的挑唆，而那些人对江青蔑视不搞革命英雄主义的原则、为自己歌功颂德、泄露领导人之间残酷斗争的内幕，以及轻率地发表与毛或集体意见截然不同的论调而心怀怨恨？”（**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 13 - 1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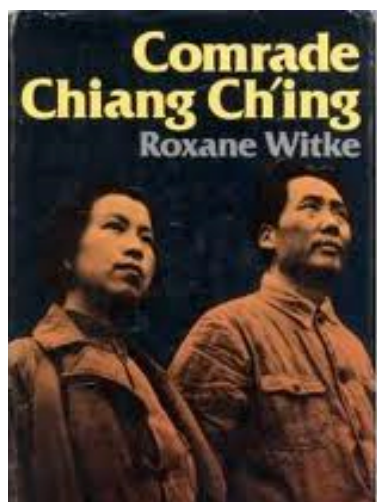
然而，中方并未停止施压。维特克说：“最后，在 1974 年 1 月，何理良（她那时刚在北京呆了三个月）再次敦促我不要出版一本完全是传记形式的书，或我所谓的‘江青同志眼中的革命史’。她问我是否还记得‘五月通告’（1973 年 5 月她和黄华警告我不要写传记），同时提出只要我答应他们的要求可以给我金钱补偿。我自然是拒绝了。出于对江青最初的意愿和对历史的尊重，我认为这些独一无二的记录不应该被埋没起来，所以我继续准备我的出版计划。”（**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 14 页**）张颖在自己的书中否认中方曾设法收买维特克版权的说

法（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178页），但是证诸华国锋在1976年10月12日与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等人谈话时所说“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中方的确采取了某些行动，只不过遭到维特克的抵制，未能奏效罢了。

虽然中方最终拒绝了提供相关的记录稿，维特克还是着手开展自己的写作。为了进一步了解江青早年在上海的生活、工作情况，维特克专程到了法国巴黎，希望见到江青的前夫唐纳（马绍章），以便得到更多的写作素材。唐纳当时在法国巴黎经营一家餐馆——天桥中餐馆。1973年6月的一天维特克与唐纳在巴黎唐人街一家名为“唐城酒家”的中国餐馆会面，维特克希望唐纳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有必要对历史负责，能够提供更多外人所不知的内情。令人遗憾的是，维特克的请求被唐纳所拒绝。（窦应泰《唐纳拒绝同威特克合作的一笔“生意”》，见《中外书摘》2007年第10期）虽然窦应泰试图把维特克描写成投机钻营，唯利是图，专门撰写花边新闻和小道消息的无聊文人，但是恰恰反映出维特克作为历史学者对历史负责的认真与执着。

维特克自己说：“经过我稍稍编辑修改过的采访报道，同时又带有自述回忆录的特征，从长远来看不是为哪个人服务，尤其不是为了江青——她对世界的看法需要一番解释。就我们之间的文化和阶级碰撞和冲突来说，如果仅仅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对这些耸人听闻的故事，凭着感觉匆匆做出评判，就会辜负了她冒险披露的她对个人和历史见证的本意，也无法进行探索。我没有这样做，我宁愿选择用这样的风格来表现她：用和她在一起之时的经历来完善她的叙述，并以我对她个人和其世界的近身观察及冷眼旁观。正如她曾好几次自信地对我说的那样，因为我不是一名记者，而是一位历史学家。”（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16页）

通过对这段话的理解，维特克显然并非仅仅根据与江青那60个小时的谈话而匆忙成书，维特克尚需作更多的准备工作，诸如收集更多的相关资料，加深对中国革命和中共历史的深入研究等。



从中国回美后，维特克在斯坦福大学呆了一年，又在哈佛大学呆了两年。这两所大学都是美国大学

里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问题的顶尖学术机构，不仅有崇高的信誉、众多的学者，还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大量的中文书籍。维特克在这两所学校应是为她自己的写作做必要的准备。在中国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维特克的《江青同志》在美国问世。整个西方世界在此之前从未有一部有关江青的传记，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长久以来深居幕后，外人知之甚少，直到文革爆发，江青才一鸣惊人，在毛泽东的扶植下一夕成名，一跃而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整整十年。而西方世界对江青的了解却微乎其微，所得到的信息大都来自官方新华社的报道，缺乏感性的第一手资料，而维特克的近身采访、实际接触弥补了这一缺陷，尽管这一访谈后的写作未必尽善尽美，但却填补了一项空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书书名朴实无华，绝无“红都女皇”一类哗众取宠的噱头，而是取自中共领导人常常自称的“某某同志”，如恩来同志、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等等，中国人读到如此熟悉的语言也许会发出会心的一笑。

张颖粗读了《江青同志》英文版后也承认：“江青谈话中的许多细节，作者都作了相当具体详尽的记述”，“全书基本上是按照江青谈话的内容梗概来撰写的”。张颖同时承认“作者并没有一味吹捧江青，而是有她的一些分析和看法，还补充和修改了江青谈话的一些内容。”张颖将维特克没有“一味吹捧江青”归结为“江青一伙已经垮台了，中国的政治环境已起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176页）。换句话说，按照张颖的逻辑，如果江青还在台上，维特克一定会出版一部对江青歌功颂德的书，这实在是对西方学者带有偏见的看法。江青在台上掌权时，维特克尚且拒绝中方对其写作的横加干涉和无理要求，更拒绝了中方的收买，维特克有什么理由听从江青或中方的指令撰写一部迎合中共领导者心目中的“中国革命史”或“江青传”？如果那样的书在美国出版，作为历史学家的维特克岂非无地自容，还能立足于美国学术界吗？正如维特克书中所言：“如果主席或中央委员会要求一部纯粹歌颂江青的作品，他们大可自己编撰一份并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予以传播。”（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15-16页）

中方为何千方百计地设法阻止维特克出版有关江青的书籍？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其实，仔细阅读《江青同志》一书，我们可以看出，中方并非完全阻止

维特克出书，中方的真实意图是要求维特克配合，期望维特克书中的观点和内容符合中方的要求，即“以毛主席的观点撰写一部中国革命史，其中包含一章或两章有关江青的内容”。可惜的是，维特克并不买账，不理睬中方的劝告，仍以自己的方式撰写和出版关于江青的书籍，这使中方大失所望。阻止江青谈话稿送交维特克的决定应该是来自毛泽东，周恩来自己绝不敢冒抵制江青的风险。迄今为止，我们尚不清楚毛泽东出于何种考虑做出这一决定。笔者认为，后面事情的发展则是由于江青的倒台，官方出于“深揭狠批江青反党集团罪行”的目的，将这一事件人为地炒大，无限上纲，而维特克也就成为现成的江青“里通外国，卖国求名”的对象。

笔者还愿指出的是，大陆一些作者不是在学术上探究《江青同志》一书的得失，而是在维特克的所谓动机上大做文章，按照官方的口径人云亦云，似乎只要证明维特克采访江青是别有用心、图名为利，积极配合了江青“树碑立传”、“篡党夺权”的阴谋，即可否定维特克学术上的努力和成就。就事实而言，大陆的作家们并无任何证据证明他们的这些观点。笔者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国内的研究者就《江青同志》一书作过任何像样的研究，相反，他们总是在子虚乌有的《红都女皇》问题上打转转。这不能不说是大陆学术界的一大缺憾。

顺带一提的是，有关维特克与所谓的《红都女皇》的流言，文革史家余汝信对此已作了详尽而透彻的剖析，可参见本文开头部分所提示的相关文章。此处不赘。

五、持续关注中国事务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外也关注中国的发展和变化。1977年3月2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杂志刊登了维特克的长文《江青同志讲述她自己的故事》(Comrade Chiang Ching Tells Her Story)。为便于不知江青是何许人的读者明白，封面上的标题改成了“毛夫人讲述她的故事”(见右图)。这是维特克在返回美国后首次公开披露她在1972年夏的中国之行。维特克在文章中讲述了她的中国之行和与江青的谈话。文中记述了江青曲折、复杂的一



生，从她的童年到演艺生涯，从上海到延安，江青与毛泽东的婚姻，毛泽东的家庭生活，中苏关系的矛盾与冲突，江青在文革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江青与文艺革命，江青对西方艺术的评论等。维特克指出，毛泽东曾在 1966 年 7 月给江青写过一封信：毛曾预言在他死后，反共的右派会上台，此信可以看成是毛给江青的政治上的交代……

1977 年，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一书在美国正式出版，由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出版发行。此书日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日文等。但是，叶永烈称该书第一次印了三万五千册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里顺带一提的是，2006 年香港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但是书名却冠以“红都女皇”，原书名“江青同志”反倒成了陪衬，这不仅违背了维特克的原意，且该书也未获得维特克的授权，侵犯了维特克版权，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1980 年到 1981 年初，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理并判刑，美联社在 1981 年 1 月 26 日从北京发回报道《中国法庭判决毛的遗孀死刑》(*Chinese Court sentences widow of Mao to death*)，该报道还配有一张江青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照片，维特克特别保留了当天发表在纽约地方报纸上的这条消息。

十年之后的 1991 年 5 月 14 日，江青在北京自杀身亡。同年 12 月维特克在《浮华世界》(*Vanity Fair*)第 12 期上发表长篇文章《毛夫人的最后日子》(*The Last Days of Madame Mao*)。在这篇长文中，维特克全面回顾了江青的一生，涉及到江青早年时期的活动，在上海和延安的经历，与毛泽东的婚姻，毛泽东家庭成员的状况，与中共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江青在文革期间的主要活动等。维特克用了较长的篇幅叙述了江青在 1976 年 10 月被捕和关押以及审判之后的生活经历等。

维特克在文中还提及 1972 年 8 月那段她与江青会面交谈的情景。维特克说：“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现代问题的历史学家，我作为客人受邀访问北京，与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以及其他长征老战士的夫人们作了访谈。江青知道此事后要求见我，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见面。”“在我与她交谈的 60 多个小时里，我发现江青身上充满了矛盾，我了解到江青对周围事务的强烈统治欲，直接了当且富有感召

力的语言和喜怒无常的情绪，此一时充满了友善，彼一时却又仇恨满腔，尤其针对那些被她认为错待她的人或事。……当她讲述中共党史有关事件时，她的坐姿僵直，她的语调变得低沉，她眼神趋向冷酷。但当讲述到‘江青是怎样脱颖而出’时，她看上去表情极为自然，她的肢体语言变得流畅，她的声调和举止毫无矫揉造作的女性化、敏感和引人入胜。”维特克认为，“长久以来，人们认为没有毛泽东，江青不可能爬到这么高的地位。然而人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江青这般全身心投入到她丈夫那一以贯之的最高权力的斗争，毛也许不会长期盘踞最高领导者的地位直至死亡。自 1938 年在延安他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他们从来都没有背弃对方。”（《浮华世界》*Vanity Fair*，1991 年第 12 期 138 - 141 页）毛泽东与江青在政治上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从这一点来看，维特克比国内某些官方学者看得更清楚，更一针见血。

2006 年 5 月 12 日到 14 日，在美国纽约召开了文化大革命 40 周年国际研讨会，不少媒体前来采访。会议召开前笔者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专门采访。BBC 记者对笔者采访的前一天也专程采访了维特克女士，请维特克就文革史和有关的江青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事后 BBC 作了专门报道。据笔者所知，维特克虽然早已退休，但是仍然关心中国事务和发展，也关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

几句题外话

走笔至此，笔者心生几许感慨。文革期间，中共曾制造了对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的影片《中国》的大批判，还制造了外贸部为引进彩电显像管考察美国康宁公司的所谓“蜗牛事件”。这两起事件在文革后都重新予以评价，承认那是在文革特殊情况下制造出来的闹剧。其实，维特克在访问中国后遭到的不公正评论与前两起事件颇有相似之处，不同之处是“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制造出来，且迄今为止无论是官方学者还是国内的当事人以及文学作者都无意予以重新评论。维特克访华与江青谈话和坊间传言的《红都女皇》毫不相干，维特克既没有非法获取“党和国家机密”，也没有昧着史学良知杜撰历史。正如维特克自己所说：“作为一个到访中国的历史学家，我只代表我自己，在我确认我所得到的材料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出版之前，我不会提供给任何人。此书将向普罗大众介绍江青的非常的一生以及与革命历史紧密相关的事迹。”（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

版 14 页) 事实证明, 维特克是一位严谨、严肃的历史学者, 为了研究中国妇女运动, 她在文革期间克服种种困难访问中国, 与中国妇女界领导人谈话, 并与江青见面会谈, 事后更潜心工作多年, 在西方出版了第一部关于江青的传记, 应该说这是维特克在史学研究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我们岂能因为江青是被官方定性的反面人物而由此否定维特克的学术成就? 我们应该从学术角度研讨该书, 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维特克访华事件, 而非简单重复当年官方“揭批查”时搞出来的大批判材料, 更不应人云亦云地在人格上抹黑维特克。令人遗憾的是, 由于江青的倒台, 维特克无端地被卷进中国政治斗争的漩涡, 至今仍被中国的一些当事人和文学作者们所曲解、误判, 难道人们不应认真地反省这段历史, 那些不负责任的言论难道还要再继续流传下去吗?

【史林一叶】

红卫兵批判诺贝尔奖

胡庄子

当年红卫兵宝书在手, 红日在胸, 不但笑傲江湖而且笑傲世界, 一切都不放在眼里, 都可以成为批判的靶子, 诺贝尔奖自然也逃不掉挨批的命运。

北京大学的红卫兵批判道: 诺贝尔文学奖, 名为文学奖金, 实际上却是国际反动资产阶级网罗走卒, 收买败类的政治工具。法国资产阶级作家萨特一语道破了它的反动本质。他说: 这是“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徒的荣誉。”事实也是如此。从一九〇一年开始颁发诺贝尔奖以来, 中选人物无一不是资产阶级的宠儿, 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锋。(红代会新人大公社沙杨桂《东方的叛徒 历史的罪人》, 《文艺革命》第二期, 1967年7月8日, 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络委员会文艺分会主办)

还有的红卫兵批判说: 诺贝尔奖金(又名“反共产主义”奖金), 以瑞典大富翁、企业家诺贝尔(1833—1896)的遗产为基金设立的奖金, 内分物理、化学、生理、文学等几个方面。奖金的发授权一直操纵在帝国主义者手里, 成为反共反

人民、收买走狗和奴才的经费。其文学奖金从一九〇一年发授起，到一九三三年都是颁发给西方作家反动文人、反革命学者。一九三三年开始则第一次发给俄国作家蒲宁，此人极端仇恨伟大的十月革命，曾叛国逃往巴黎，接着在一九五八年发给反共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反革命叛徒分子帕斯捷尔纳克。一九六五年当发给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鼻祖、大叛徒肖洛霍夫时，他受宠若惊，向帝国主义大摇其哈巴狗的尾巴，到处演说，感恩不尽。（《诺贝尔奖金》，无署名，《红旗 电影批判 井冈山》联合版，1967年7月15日，北航《红旗》报等主办）

红卫兵批判诺贝尔奖金，可能源自江青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批判。《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莱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

肖洛霍夫1965年10月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被造反派称为“大毒草”。红卫兵说：“肖洛霍夫身上散发出了浓烈的反革命气味，因而博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欢心和青睐。一九六五年十月，瑞典科学院把专门为收买‘东方叛徒’的、被称为‘反对共产主义的诺贝尔奖金’授给了肖洛霍夫。身为苏共中央委员的肖洛霍夫对这笔奖金垂涎三尺，他几次表示愿意接受这一奖金。”（《打倒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肖洛霍夫》，《向文艺黑线猛烈开火》第314页，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1968年4月编印）国内几乎所有报刊都发表了批判肖洛霍夫的文章。红卫兵报刊上还发表了许多讽刺肖洛霍夫领诺贝尔奖金的漫画。

面对来自中国的批判，肖洛霍夫是什么表情？1966年5月，他访问日本，听说中国正批判他，一笑置之，悠悠然钓鱼去了。几天后，又有记者问：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说您是“叛徒”的文章，您如何看？肖洛霍夫答：对这个嘛，我没有可说的，不过用一句俄罗斯谚语来说就是，任凭野狗狂吠，马却安然向前。（日本《朝日新闻》1966年5月15日、27日）红卫兵对此批判道：“1966年5月，肖洛霍夫访问日本，在访问期间，大放其毒，丑态百出。……他对中国

人民对他的叛徒嘴脸的揭露和批判，恼羞成怒，暴跳如雷，肆意污蔑，恶毒攻击。肖洛霍夫在日本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这个叛徒已经坠落到何等地步！”（《送瘟神——全国 111 个文艺黑线人物示众》，原中国文联批黑线小组 1968 年 9 月编印）

【蓦然回首】

南京“12·10”公判四十年祭

方子奋

又一个四十周年纪念日到了。

人生苦短，从呱呱落地到遗体告别没几个十年，逢十纪念一生中大事，自然而然成了一种无奈选择。

作为年届古稀的草根老者，所谓的纪念，无非只能是敲几行文字，再现一下当年火红革命年代的血腥场面，纪念的目的，也只是在当今以谎言掩埋历史的时尚中，希望已经遗忘者，正在遗忘者，包括未经历过那段血腥岁月的后人们，都能记住历史上这个滴血的日子——1970 年的 12 月 10 日。

这一天，是南京在 1970 年“一打三反”运动中第四批集体处决“现行反革命”公判大会召开之日。那个下午，南京五台山露天体育场又一次席地坐满了看客，按最保守估计，至少有十万之众。有了以往公判大会的示范，谁都清楚公判大会意味着什么，大会开始前那一小段时间，人们像如今探讨股市行情一样预测今天要杀多少个，不少人一面贪婪地嗅吸空气中的血腥味，一面急不可耐地翘首以待死刑犯出场。嗜血，早就成了革命的时髦。

不过，如此众多的看客中，有两点绝大多数人都没想到。

一是那一天是国际人权宣言纪念日。对 8 亿中国人来说，还根本不知道世界上绝大部分民主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精神，早在 20 年前就已联合签署了国际人权宣言，那一天正是国际人权宣言发表 20 周年的纪念日，而宣言的核心条款是“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还有一点令看客们没料到的是，在被绑上审判台上的死刑犯中将有一对母

子，他（她）们将因“现行反革命”罪同时在今天被处决。古今中外数百年来，从未有过同时处决母子政治犯的案例，那一天的公判大会，给了十万观众大饱眼福的机会。也给当代历史创造了一项“中国之最”。

这对母子，正是我年仅 26 岁的挚友李立荣，和他六十岁的老母林舜英。母子罪名雷同：猖狂进行反革命活动，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

十年之后，南京市中级法院给这母子二人的平反结论也一样：“经查，所谓反革命活动，并无事实，应予否定。所谓攻击言论，主要是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不满，只是其中说过比喻不当的错话。因此，原以反革命论处显属错判。”

平反后，母子二人的经济补偿也分文不差——每人 750，合计人民币 1500 元整。

公判大会开始后，宣判的首案就是林舜英母子。由于事先都不知道即将面临枪口，在听到判决的那一瞬间，母子二人发了疯似地挣扎着想喊什么，但那根套在脖子上的绳圈立即将他们在人世被迫发出的最后吼声勒回了胸腔。

这根 Q 形绳圈，至今仍然当作革命传家宝在继续沿用，当年柬埔寨波尔布特，如今的金家父子，也都爱用这种 MADE IN CHINA 的原创专利。

当然，也不是所有革命领袖都有这个爱好，我在一篇文章中看过一个小故事：以严厉镇压反革命著称的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接受奥莉亚娜·法拉奇采访时，后者曾提到某些国家在处决政治犯时会用绳圈勒住喉咙不让其发出声来，当时卡斯特罗撇了撇嘴：“我们从没这样做过，那太过分了！”

在那个天日晦暗的下午，在会后长达十公里通往刑场的游街示众途中，有几十万人沿街列队观摩，只是没人能看清这对同赴刑场母子的面孔，那是因为他（她）们的脑袋早被绳子勒得“低头认罪”。留在人们印象中的，只有插在母子颈后高高的亡命木牌，以及林舜英在寒风中飘拂不定的满头白发。

下午 4 时许，南京水西门外凤凰西街尽头拐弯处的刑场响起了一排枪声。包括林舜英、李立荣母子在内的 10 位“现行反革命”，当场饮弹毙命。

两小时后，10 位活生生的“现行反革命”全部化为白森森的骨灰。没人认领，没人掩埋，没人过问，没人知道去向。

当年的凤凰西街刑场，如今早盖满了高层建筑；当年的清凉山火葬场，现在

成了“国防园”。我不止一次去过当年刑场旧址。有一个夜晚，当我蹲下身点燃特意带去的纸钱时，一阵突然而至的怪风将纸灰夹着火星吹得漫天乱飞，我明白此地冤魂太多，这薄薄一沓纸钱实在不敷他们分享，我赶忙凝神祷祝：“安息吧，兄弟姊妹叔伯婶姨们，不是所有人都忘了你们，我不是来了么？”语毕，那风竟倏然消逝。

我也去过“国防园”，当我看到陈立在空场上的大炮时，不由想起亚瑟临刑面对枪口时对士兵们的那番话：“轮到你们收拾你们时，将用大炮代替你们手中这半打破旧的马枪！”可报复真能解决一切问题吗？我抚着冰冷的炮筒不禁老泪纵横。

我在劳改队中看到李立荣母子判刑布告是在他们遇难的三天后。判死刑的都有照片，脸上打着红叉叉。左上第一是林舜英，第二是李立荣。我记得紧邻李立荣的是位相貌出众的姑娘，她的姓名我已忘掉，只记得处决时年方 25 岁，罪状之一是“用极为恶毒的手段污辱伟大领袖”，且“归案后态度极为恶劣”。这两个“极为”，使我永远记住了这位年轻美丽且又坚毅刚烈的姑娘。四十年后的今天，我谨向这位亲爱的异姓妹妹奉上深沉的悲悼。单凭你能和我那位异姓兄弟同年同月同日同时一道死于那场疯狂的杀戮，你同样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就在林舜英、李立荣母子同遭处决的当时，作为八大革命样板戏之首的电影《红灯记》，正在全国影院热播。同样是一对母子，同样姓李，同样是母子同被处决，何等富有戏剧性、何等出色的巧合！略有不同的只是，愚蠢的日本鬼子竟然没想到在李玉和母子的颈子上套一根绳圈，非得让李玉和母子从容不迫喊完一长串口号后才开枪……

整整四十年过去了。四十年前凤凰西街刑场枪声响起之时，刽子手们恐怕无一不认为这种无法无天的暴行已经被历史的尘埃所掩埋，谁也不曾料到二十年后会出现一个叫“英特网”的怪物，正是这个活该千刀万剐的“英特网”坏了事，将他们力图掩埋历史的如意打算化成了泡影。也正是通过“英特网”，林舜英、李立荣母子的不幸遭遇得以越过重洋让异国他乡的人们得以了解中国文革内情。

我的《南京慧园里 6 号的母子冤魂》发表后，收到很多包括来自美国、法国、英国、瑞典、日本、台湾和国内网友及读者们的 Email，他们除对李家母子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外，并托我转向李家后人表示亲切问候，有不少网友专门到南京

慧园里 6 号进行了凭吊。最令我感动的是，杭州一位年轻女网友，伴同她父母、外祖父母老少三代五口，特地从杭州赶来南京慧园里，为的就是看一眼那幢老楼。当我要引领他们上楼和李家后人见面时，那位满头银发的外祖父婉拒了我：“不必了方先生，我们全家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看一眼这幢老楼，不必再打扰他们家后人了。”临别时年轻女孩悄悄将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外祖父是级别可以的老干部，看了您大作后有点将信将疑，这次见到老先生您本人，又亲眼目睹了慧园里 6 号老楼，他不再怀疑了。

在致我的邮件及数量相当可观的跟帖中，那些感情色彩强烈的文字进一步坚定了我的信念——靠杀人是消灭不掉异端思想的，杀人，只能激起更多的仇恨，尽管事情已过去了四十年！

1941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著名的“四大自由”演讲中最后一条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其实，这不仅仅是针对民众百姓而言的，对统治者又何尝不是如此？杀人者的恐惧，往往更强于被杀者的恐惧，杀人越多，恐惧越大！

马克思有一句至今仍被奉为经典的名言：“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然而，在马克思的信徒中，有几个懂得“解放全人类”的真正含义？一心只知道用杀人来消灭异己，用 Q 形绳圈来使别人噤声的“大救星”，已经被英特网牢牢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马克思泉下有知，大概会想起海涅那句名言：“我播下了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青山关不住，毕竟东流去”。四十年后的今天，好歹我能在此公然祭悼死去的朋友了。而四十年前的今天，我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老鼠，吱都不敢吱一声。过了年我就是出七奔八之人了，我的健康状况可能等不到十年后再写“五十年祭”了。

不过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我相信，“和谐社会”不仅仅是空头支票。

【口述历史】

从“特嫌”到“反动权威”

——中央音乐学院风雨岁月琐忆

黄飞立 等口述

1、南线阁忆旧

中央音乐学院最初是由几个学校合并的，其中以南京的国立音乐院为主，也包括燕京大学音乐系、北平艺专音乐系等等几个学校。刚解放的时候，北京没房子，所以暂时就给搁在天津。后来我们跟苏联关系闹僵了，北京的留苏学生预备校停办，中央音乐学院把它的校舍接收过来，就是今天鲍家街的这个地方，原来是醇王府的一部分，光绪就生在这里。

我们搬进来的时候，院子里有一个大礼堂，2到5号楼都既做教室、又做宿舍。其中3号楼特殊一些，每层有两个大教室，差不多可以容纳二十多个学生，分给我们这些教授级的老师当宿舍。比如我住三层，旁边住的是喻宜萱，楼下是钢琴系教授朱工一、管弦系教授夏之秋，另外像易开基、张洪岛、黄源澧都是这样的房间。我住的那个教室很大，用书柜、沙发隔开，一家五口挤一起。不过已经很不错了，只有系主任、教授可以享受这种待遇，别的人都是住筒子楼，一家三口、四口挤一个小房间。那时候还没有煤气，做饭都是烧煤球灶，每家门口放一个小炉子，晚上封火，既让它燃烧，也不要烧得很旺，第二天早上拨开，捅火加新煤球。筒子楼一家一家紧挨着，所以走廊挤得很，除了煤球，还有各家的冬储大白菜。后来实在没办法，改成在楼梯拐角那个地方集中做饭，你烧你的煤球，我烧我的蜂窝煤。

到了60年代，音乐学院在广安门的南线阁盖了一栋五层的宿舍楼，我分到了一套半，条件比以前好得多。往南是一条很小的胡同，再过去是面粉厂、造纸厂、钟表厂，还有一个做陶器的工厂，所以那片儿住的差不多都是工人。后来到了文革，知识分子被人看不起，我的老三安乐经常受周围人的欺负，说他是狗崽子、小四眼，还把他的眼镜抢走。现在那些平房都拆了，工厂一个个迁走，盖成新的高楼，只有我们那栋旧楼没拆，这回成了“鸡立鹤群”，十分碍眼。

我在南线阁住了差不多三十年，文革过后，一个加拿大《环球邮报》的记者要访问我。那会儿还没到邓小平说开放的时候，但已经跟外国有了接触，赵沅院长到南线阁来，说：“这个记者可以见见，他对我们是友好的，这个我知道。”我说不见。“怎么啦？”他说。因为我和赵沅很熟，随便讲讲无所谓，就说：“第一，

我 1951 年回国，跟美国完全断开联系了，文革时还被说成特嫌，我已经发誓再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了。”他说：“唉——，不要紧，这个事情我知道，不会有问题的。”我说：“你现在说的好听，文革你不是也挨整吗？毛主席说将来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到时候你‘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能保我吗？”一句话说得他也笑了。

接着我又说：“第二，不管怎么样，我毕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系主任，可你看我住的这个地方——”我家比较窄，过道算一小厅，放张小桌子吃饭用，中间的客厅又是书房，又是看电视、孙子练琴的地方，另外那一小间是我老三一家住。本来有两个厕所，后来把其中一个改成卧室，给我孙子住，到处破破烂烂的。我说，“你看我这个地方，接待一个西方来的记者，不丢国家的脸吗？”他看了看，嘟嘟囔囔说：“这样吧，你把客厅收拾一下，其他地方就别让他进了。”没过两天，那个记者果然来了，而且带了夫人和两个英国使馆的朋友，人多得坐不下。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文革以后第一个采访中国知识分子的西方记者，后来写了一本很厚的书，叫 *THE CHINESE, Portrait of a People* (By John Fraser, 1981.)，并且得了大奖。

2、从《嘎达梅林》到《红色娘子军》

从 1958 年开始，音乐学院从天津陆续迁回北京，一个系、一个系的往回调，指挥系回来得最晚。那时候管弦系在北京排《嘎达梅林》，准备十周年献礼的节目，由系主任章彦指挥。

《嘎达梅林》是辛沪光（1951 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毕业作品，当时作曲系学生的作品常常在中央乐团试奏，或者演出。《嘎达梅林》首演是由一个年轻人指挥，演完就完了，并没有引起注意，甚至于我在天津都没听说这部作品。等到我们搬回北京，忘记是什么原因，章彦又把乐队交给我。那时辛沪光已经嫁到内蒙，于是我把她找回来，有的地方跟她商量，做了一些修改。50 年代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应该说是不错的，她下了很多工夫。那时候人民大会堂刚刚建成，头一场音乐会是慰问建筑工人的，演的就是《嘎达梅林》。后来正式开音乐会，那一次很成功，电台、唱片公司都来录音，一下就红了，等韩中杰在中央乐团又排《嘎达梅林》，还把我的那个录音拿出来给大家听。

辛沪光：作曲系每学期末都有作品演出，学的什么就写什么。毕业作品是写什么都行，包括有的同学就写一篇论文，那也可以，但大部分还是写作品。《嘎达梅林》是我的毕业作品，当时配器还没完成，所以毕业音乐会是演我别的作品，其中黑管独奏是包玉山吹的，后来是我的老伴儿了，当时还是我弹的伴奏。

毕业后，我去了内蒙歌舞团，但他们的乐队是单管编制，演不了《嘎达梅林》，于是我把谱子寄到中央乐团，张孔凡是首演指挥。后来音乐学院的乐队也经常到学校、工厂演这个曲子，但毕竟是小范围的，知道的人很少。直到1959年作为建国十周年献礼，那一次是黄飞立老师指挥，最后灌唱片的也是他，而且他在排练中提了很多建议，那我当然会听的。记得他还夸奖我，说：“哎哟，你现在进步很大，写谱子比以前好看多了。”哈哈……

我是1951年入学，正好黄飞立从美国回来，在作曲系教了两年和声、复调，所以我也非常有幸。当时的师资相当好，教作曲的有江定仙、陈培勋，苏夏老师教作品分析，王震亚教戏曲、歌曲作法，还有燕京大学过来的许勇三教音乐欣赏，杨儒怀先生当时还是助教，现在是大专家了，都很棒。当时很多老师都是留学回来，包括有留美、留德，王可之（50年代自杀）、江文也留日，萧淑娴留比。欧美特别注重人性，非常尊重人，所以留学欧美的和后来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人感觉不一样。等我们毕业那年，赶上了苏联专家阿拉伯夫讲作品分析，他的太太托多诺瓦讲歌剧分析，都是水平挺高的。另外，我们还请过一些民歌老师，包括唱花儿的那个老祖宗朱仲禄先生，还有陕西的那些老艺人，哎呀，唱得真有味道，的确收获挺大。包括山西的刘改鱼，原来土的不得了，现在经常上电视，时尚得很。

说实话，我们那一拨学生还是很幸运的，虽然运动不断，但基本上跟我们没关系。黄先生是从美国回来的，他有许多新的东西，自己编教材，而且教得非常

活，不是说用死教材的那种。比如上复调，有一次他让我们用中国的音调写赋格，那可真把我们难为了，一不小心又写成巴赫味儿……

1964年排《东方红》，选了很多人去指挥，其中有一个芭团（中央芭蕾舞团）的指挥，叫黎国荃。他的琴拉得很好，从前在陶行知的育才学校当过音乐组主任，在重庆的中华交响乐团当过首席和指挥，可惜文革时候自杀了。排《东方红》的时候，芭团正开始排《红色娘子军》，黎国荃忙不过来，就打电话给我，要我帮他指挥。因为时间非常紧，常常是吴祖强、施万春他们写好一段、我排一段，粗粗看一下总谱，赶紧交给团里抄分谱。等这段刚排好，新的内容又来了，一直到彩排。那时候主要是赵沅管这个事，他常来听排练，倒是黎国荃连看的工夫都没有。最后是在天桥剧场彩排，江青来了，第二天报上就说：在江青同志亲切的关怀和领导下，又产生了一部新的民族芭蕾舞剧。当时我还很纳闷：“从来也没见江青来过，怎么一下子就把功劳归了她呢？”

在这以后，江青的确开始插手这部作品，这场怎么样，那场怎么样，这段音乐不好，砍掉，那段要改。据说施万春有一段音乐被砍掉，回家后，他把棉被盖在头上痛哭一场。那时候，指挥系有一个我毕业班的学生刚从中央乐团实习回来，知道我在排《娘子军》，于是就来找我。一来是想听我排练，二来他跟我说，如果有机会，是不是也可以让他上上手。我说没问题，所以每排完一段，就把那段的总谱交给他看，只是因为时间非常紧，一直没合适的机会让他上手。临近演出，有一天他来找我，说：“黄先生，我想把总谱借去看看。”那当然没问题。那时候我喜欢在枕头旁边放一个收音机，晚上听午夜新闻。就在那天晚上十二点钟，听到说：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看了《红色娘子军》。

怎么可能？第二天我到芭团问他们的党委，他们就搪塞，说：“哎呀，临时来不及找你，就让×××上了。”

本来我很生气，但他们这样说，也就过去了。跟着就是在天桥剧场的正式首演，那一次是我指挥的。后来又广州演出，还要到深圳，但是音乐学院把我紧急调回北京，跟工作队到通县搞“四清”去了，黎国荃接替我指挥。

一直到文革后我才知道，原来那时我已经被定为有特务嫌疑，是被审查的对象，只能受控使用，不得进大会堂，不得接近首长。深圳是边防地区，当然不

能去。记得我在广州的时候，赵汾有一次专门飞过来，跟包括我在内的小组说，江青对剧情有意见，要剪接一下。音乐剪接不是那么容易的，调性、连接等等，有许多技术问题，就让我做了这个事情。文化大革命时说我篡改样板戏，还好，最后没有批判成。

吴祖强：《红色娘子军》开始还不叫样板戏，只是说要创作“革命芭蕾舞剧”。当时我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老师，又是支部书记，于是组织了几个年轻教师，由我和杜鸣心领头，又添了三个年轻的，大家一块儿写。当时是集体创作，不署名，也没有任何酬劳，包括后来首演，几个作曲的人连票都没有，最后谢幕是林默涵、赵汾出去，算是在他们两位指导下的作品。

首演之前，江青看过一次彩排，事先也没有通知，忽然她就出现了。不过，那时候她跟我们说话还是“供参考”，很客气，不像后来那么霸道。而且说句公道话，有些地方的确也是起了好作用。比如关于剧本结构，最初舞剧版本是按照电影改的，里边除了琼花，还有一个丫头的角色，后来舞剧里把这个角色给拿掉了，就突出一个琼花，人物变得清晰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江青的确是一个行家的眼光。

当时我们边写边排，半年就完成了。首演前有一场在人大礼堂三楼的演出，是给毛看的。因为我们的乐队有六七十人，而那个小礼堂的乐池只能塞下四十人，所以临时又把总谱改了一下，减少编制。本来指挥一直是黄飞立，但说他有特务嫌疑，所以那一次用了个什么理由，让副指挥去了。

文革高潮时候，江青定了八个样板戏，北京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相应的，上海搞了《白毛女》。等到江青全都管的时候，她要改，就让李德伦来主持工作。因为我是“二流堂”吴祖光的弟弟，这个人不能用，所以把我排除在外了，

就像京戏《红灯记》把阿甲排除在外一样。后来，江青又提出过许多意见，比如关于琼花的主题，说应该像《流浪者之歌》那样等等。据说折腾了二百多个主题，最后又回到原版，只是变了几个音。原来女主角叫琼花，我们觉得挺好，但不知为什么，江青给加了一个姓，叫吴琼花，后来又改成吴清华。舞蹈演员白淑湘家庭出身是反革命，对江青不尊重，所以拿掉，并且坐了几天牢。江青挑了一个当初演 B 角的薛菁华，据说讨论的时候，江青说：“她长得像我嘛。”就这么给换了。

“四人帮”倒台以后，样板戏一时都停了。过几年，《娘子军》又逐渐恢复，先是演一场，后来又演一场。八个样板戏后来的命运不太一样，《红灯记》是留下来了，《沙家浜》留下来了，《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也留下来了。抛开政治方面，其实这几部作品在艺术上的确可以成为经典。比如《娘子军》，大概迄今为止，是中国芭蕾舞上演率最高的。因为那时候是集体创作，大家都可以提意见，磨来磨去，一个戏要改多少年，真是精雕细琢。而且就演奏来说，现在怎么都没能达到文革的水平，那会儿谁敢出错？那可是政治问题。

文革之后，《娘子军》又演，忽然好像恢复了作者的名字，包括杜鸣心、施万春、王燕樵、戴宏威，只是把我给排除了。但因为整部戏又回去了，整个架子、基本的音乐还是原来我弄的，所以我抗议了一次。芭蕾舞团也觉得不合适，后来送了一张票给我，请我去看。剧场字幕打出来，我看那上面的署名，作曲一项前面还是他们四个，忽然后面又补了一页：吴祖强。而且，因为他们四个占一页，我是后补上去的，单占一页，所以我那三字儿特别大，显得特别可笑。

3、“我是牛鬼蛇神”

文革以前，应该说，我还是很受重用的，并且有一天忽然通知我，说是成了天津市的人大代表，那一定是对我的信任与重视。文革开始的时候，有一天中午

我没回家，下午刚到教室，忽然全系的人都来了。大家坐下后，一个女生对我大喊一声：“黄飞立，站起来！”接着向我宣布：“黄飞立，你有罪，你要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然后不容分说，宣布“解散！”大家不吭一声地离开教室，剩我一个人不知所措，只好垂着头回家。那天正好是我六十岁生日，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不久，文化部办了一个学习班，把各个直属院校、团体主任级以上的干部，以及一些有名的教授，集中到海淀白颐路的社会主义学院学习。那个地方还不错，就在理工大学附近，吃住条件跟三星级宾馆差不多，每天除了学习，就是和军代表谈天说地。吃完饭，大家一起散散步，满院子都是院长、系主任，倒也很惬意。

过了一阵，各单位开始纷纷把人抽调回去，比如某天下午，忽然抽调赵飒回音乐学院，开批斗会。他站在台上挨批，我们坐在台下陪斗，军代表还跟我说：“好好学学吧。”当时各学校情况都差不多。据说戏剧学院副院长李伯钊回去挨斗，旁边给她纸笔，让她自己记录，结果只写了四个字：一派胡言。那时候正是夏天，赵飒挨斗以后，气鼓鼓地回到社会主义学院，买了个大西瓜，一个人大吃。

那时候的批斗对象仅仅是院长或者校长一级的，比如马思聪、李凌、赵飒等等，还没轮到这些系主任。差不多过了一个月，有一天军代表宣布：“学习班结束了，现在你们都回原单位，参加运动。”我和章彦还挺高兴的，洗澡，然后换一身干净衣服。音乐学院总共去了十来个人，下午一起坐车回来。快到校门口，大概还有几十米的样子，就听见里面锣鼓喧天，不知是因为什么事情，喊的什么口号也不大清楚。司机把车停下，让我们自己往前走。刚一进校门，旁的我也没看清，就觉得后背被人热乎乎地拍了一下——其实是被抹了糨糊，大概刚煮好，还热乎乎的，接着就被贴了大字报。脖子上挂一块牌子，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根哭丧棒，抬眼一看，前面赵飒是给披了一件破羊皮，戴个高帽，手里拿着破脸盆，让他一边走一边敲。

叮叮当当，我们这些人敲着脸盆在学校里游街，从大门口到里面走一圈，然后站在大礼堂前的台阶上。那儿已经站着一批没有到社会主义学院的教授，包括萧淑娴、苏夏、吴祖强等等，满满堂堂。下面的学生、群众一片狂热，大喊：“打倒×××！”“打倒×××！”“毛主席万岁！”……闹一阵差不多了，人群散去，我们马上被吆喝着到院子里劳动，拔草、扫地。教作曲的萧淑娴，学生把她的高

跟鞋扔掉一只，让她穿着一只鞋子劳动。

天晚了，苏夏、吴祖强等等“二类黑帮”可以回家，“一类黑帮”继续留下，住进5号楼后面的一排练琴房，两个人一间，只有两张光秃秃的硬板床和一张小桌。分配好住处后，红卫兵命令我们排队到食堂，每人给一个大碗，盛些剩饭剩菜，混在一起吃。之后，允许我们到澡堂洗澡。脱下衣服，我才看到背上粘着的大纸，写着“反动学术权威黄飞立”，胸前挂的黑牌上是“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反动文人”。这就是我的身份？当时我的头一个反应，不是我回国错了，而是不幸被那些警告我的美国人言中。我想，今后我可以去修自行车、修无线电，总之，干什么我都不干文艺了。

当时像我这样的“一类黑帮”有二十个上下，头两位是大学、附中的党委书记，下面是马思聪、赵汾，附中的校长俞慧耕、方堃，接下来是一大批系主任，站起来有两大排人。头几天真是懵了，不过后来看大家都这样，也就无所谓了。我跟作曲系江文也的任务是打扫厕所，每天挂着“黑牌”到楼里干活。大概是怕我们偷懒或者怎样，总之，两人不能凑一起。早上十点来钟，我进4号楼，管弦系的黄日照准时端一个脸盆出来“倒水”，上面盖个盖子。我前脚刚一进厕所，他后脚就跟进来，看看没有人，赶紧把脸盆打开，里边是一杯热乎乎的牛奶咖啡，说：“喝吧，喝吧。”之后，他站在门口望风，等我喝完了，他端起脸盆就走。天天如此。

冬天，有一次我们在1号楼后面的空地劈柴，正好校外一队红卫兵来观摩，大概是想看一下怎么斗我们这些黑帮的。于是，红卫兵把我们集合、训话，齐唱《牛鬼蛇神歌》，又叫《嚎歌》，那是通行全国的：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砸烂——，砸碎——

唱了一遍，红卫兵不满意，说：

“沈湘，你不是大声乐家吗？你来单独唱！”

“我是牛鬼……”

“不行！用美声！”

“我是牛鬼蛇神……”

“不行！不够！！你平时怎么唱意大利歌剧的？就照那样，加动作！”

沈湘气得不得了，瞪圆了眼睛，高举双手，唱道：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砸烂——，砸碎——，噢~~~”

之后，红卫兵又把党委书记刘峰锐叫出来。刘是部队从苏北派来的，那时候已经是个老太太了，口音很重，普通话都讲不清楚，而且五音不全，红卫兵让她单独唱，那真是难听极了。“不行！……喻宜萱，你负责把她教会，明天我们再来检查。”不过第二天他们并没有来，我们也知道不会来。这些外地到北京大串联的红卫兵，很“忙”的。

过一阵，到了“反对资产阶级路线”的阶段，很多音乐学院的学生到外地大串联。于是我们自己“造反”，写了一个声明，不承认是敌我矛盾，自动退出劳改队——回家！我还把那块“黑牌”带回去，放在书柜里。马思聪就是那一次跑掉了。那些日子，张洪岛、朱工一、苏夏常常晚上到我家里聊天，说笑话。一天，我跟苏夏两个人骑自行车，从南线阁到八大学院去看大字报，正好碰上谢添。因为我和他很熟，他在马路对面，老远就冲我招手，大喊：“黄飞立——，怎么样了，你？！”其实他也不好过，但他就是那么一个人，总能让人感到愉快和安慰。

赵方幸：学生来抄过几次家，一次是声乐系的学生来，把我的项链、戒指，连同黄老师的领带，一起都拿走了。包括我出嫁时妈妈送的金项链，上面穿着一个镶了金边的玉坠子，碧绿碧绿的那种，应该是翡翠吧，很漂亮的，并且打了首饰行的店标，平时我都舍不得戴。还有黄老师的妈妈送给我的珍珠戒指，也是很大一颗，都让他们抄走了。临走又发现了一块美金，说：“啊？美金？”黄老师刚到美国时候，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朋友送他的。因为他们有个说法，口袋里装一块钱，一辈子都不受穷，所以这一块钱我一直留着，结果也被抄走了。

还有一次，也是几个学生到我家里搜查，主要为了一个收音机。那是我从天津一个拍卖行里买回来的，忘记什么牌子了，总之相当高级，可以收中、短波。其中短波又分成八个波段，大概全世界的短波都可以收到，并且是扩展了的，台跟台之间不像普通收音机挨得那样近，所以声音很棒，不会滋滋拉拉响。结果他

们说那是一个发报机，特意来抄这东西。不过还好，没搜到。指挥系的黄立明也被要求跟着一块儿来，当初是我考他进来的，他的父亲是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红卫兵让他到我的小屋搜查，进去以后他随便看看，说：“没什么……没有什么。”就退了出来。这时候，另外一个学生在书柜里发现了那块“黑牌”，大吼说我是预备“秋后算账”。

这个学生姓潘，并且是我的主科学生，后来有一次他们在教室开会，把我叫来“提审”，说：“黄飞立，你知罪吗？！”样子非常凶。我说：“我可能有错误，但我不觉得是敌我矛盾。”通！一拳冲着肚子打过来，接着又问：“沈湘是什么人？！”我说：“沈湘声乐上有水平，但我不觉得他是反动权威。每次运动都挨整，没权，更没有威。”通！又是一拳。“赵泓是什么人？！”“赵泓现在还不能下结论，要看他文革以后是不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通通通！连续几拳打过来。那时候他才二十出头，可我已经六十了，几拳下来真是吃不消。旁边一个女老师冷冷地说：“你这不是自己讨揍吗？”

文革中，有些人是真心响应号召，积极投入过；有些人因为家庭出身不大好，于是就表现得极革命；有些是大势所趋，随大溜，心里不一定那样想；但也有的人心地不好，有企图，用踩别人来抬高自己。总之，各式各样的人都表演过。

文革以后，很多学生主动向我道歉，认为自己当年无知，以为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那样就是革命了，我都没有怪他们。比如附中一个搞作曲的女生，她是高干子弟，有一阵剃了光头，整天穿着皮靴在学校里打人，带红卫兵来抄我家。但是在文革中觉悟了，向我道歉，并且完全变了一个人，以前那样激进，后来变得沉默寡言。其实我完全理解她，也原谅了她，包括其他人，有的我们还在一起工作，至今依然是好朋友。只有这个潘，本来有好几次机会，完全可以向我表个态，但他始终没有。后来找工作，很多单位知道他动手打我的事情，都拒绝了他，最后是民族学院的一个乐团把他留下，据说也很不得意。几年前，潘去世了，临终没有人陪伴，死了好多天才发现，很可怜。

张洪岛，管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文革中红卫兵打他耳光，把他一边耳朵打聋了。

李菊红，钢琴系教授。当年司徒雷登是她的证婚人，那在文革中肯定没跑

的。

沈湘，声乐系的名教授，圣约翰大学毕业，和我的弟弟飞然是同班同学，英文挺棒，当过美军翻译。不过那时候都是爱国才去的，而且后来经过审查，的确没有问题，还是老被揪着。说他是马歇尔的翻译，是反革命，因为喜欢用打字机，就说他是在发报。所以那时候，沈湘日子不好过，从肃反、思想改造等等一直到文革，一次不落，每次运动都有他，是“老运动员”了。

章彦，管弦系主任，在南线阁就住我家对面。刚进劳改队那阵，有一次红卫兵抄家，同章彦的小儿子发生了冲突。到底有没有打起来我不清楚，但因为这个事情，“狗崽子”对抗红卫兵，音乐学院专门开了一次批斗会，章彦被红卫兵用皮鞭打昏了过去，架回“黑帮院”三天没起来。那一次，我们这些老师都跪在地上陪斗，有个学生偷偷拍照都被拉出来打了一顿。赵老师怕我受不住，跑到“黑帮院”送来一本《毛主席语录》，只说了两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我和章彦、程静子是老朋友了。章彦接替我当了管弦系主任，后来因为传染上肝炎，老住院，于是黄源澧接替他做了系主任。文革以后，程静子得脑癌，开了两次颅，最后是在家里去世的，章彦不久也去世了。

反右以及文革期间，中央音乐学院没人自杀，虽然有人跳楼，但是不遂。到了文革后期，一位印尼华侨上吊，叫郑华斌。这个人不是学音乐的，抗战时候一个人回国，后来留在少年班和附中照顾学生的生活，为人好极了，那帮小孩都叫他“郑妈妈”的。不晓得什么原因，有人风言风语，大概因为他是华侨，结果上吊自杀了。

相比之下，中央音乐学院的情况还好，但上海左得厉害，好几位音乐家自杀。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是留美的，夫人程卓如是附中的副校长，两口子都非常出色。文革开始，学生让他们把鞋脱了，互相打耳光，男的打女的，女的打男的，两个人回家开煤气自杀了。另外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陈又新，钢琴系主任李翠贞，钢琴家顾圣婴和她的母亲、弟弟，中提琴家周杏蓉，搞音乐理论的沈知白等等。

文革前批“大洋古”，宣武门教堂里有个管风琴，赵泓不忍，想把它保护起来。于是打了报告，经上级同意，拆下来放在学校空地上，预备安在礼堂。不久，

文化大革命开始，赵飒成了“黑帮”，许多事已经管不了啦。那些红卫兵在管风琴上乱扎乱杵，甚至有人把零件搬回去打家具，结果整个被毁掉。也许当初不拆回来会好一点？谁知道。

4、下放清风店

1969年“九大”之后，劳改队取消，并没有人宣布说：“你们解放了。”或者“你们不再是‘敌我矛盾’。”没人说过这样的话，也从来没有人道歉，只是说：“你们回家吧。”接着，学校发我们每人两个麻袋，让马上回家收拾东西，跟大家一起下放。不管是革命的、还是被革命的，左派还是右派，都统统下去，并且一去就是两年多。当时我的老二、老三都在念小学，一个五年级，一个三年级，但是我和赵老师全都要下去，真是非常难。

当时音乐学院一共分成三拨，天津一拨，保定清风店一拨，再有就是张家口。学校全部改成军事编制，我们这拨人被派到清风店38军驻地，大学的老师和学生是“文艺一连”，附中的老师和学生是“文艺二连”，职工都在“文艺三连”。所有干部都是38军派来的班长、排长、连长，我们到了以后，班长出来训话，说：“你们这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下放来就是要接受再教育，我们就是要改造你们的。”他多大？大概不到二十岁，还没有安伦大（注：黄安伦，黄飞立的儿子。参见本刊总第35期：汤铭口述、文靖执笔《造反、偷书看与下放部队农场》）。

大家同吃同住，但有一点不同，只有明确不是“敌我矛盾”的才有资格参加学习。包括他们每天列队、齐步走，这些我都不能参加。有两次行军我去了，但打靶子是不能参加的。所有重体力劳动几乎都是我们这些“黑帮”、右派来干，我是“一类劳改”，基本上就是掏大粪。每天跟教黑管的张梧和教作曲的王树一起，一个人往外耙、一个人扫、一个人推粪车，推到营房边的一块地里，挖个坑倒进去，然后盖上土，这叫“积肥”，一天到晚都是这个，差不多干了有两年。有一次连长打对面来，我刚要打招呼，他把头一扭，看都不看我的。

38军是林彪的嫡系部队，并且被他们引以为骄傲的，包括下面跟我们聊天，动不动就说：“我们是林彪的部队，我们……”后来过了一阵，林彪发生了事情，他们也不吭声了，从此完全不敢提自己是谁的部队，而是改成批林批孔。那个“四号”也是个极左，口才真好，经常全连做报告。可到了文革后期，已经有风声说

要回北京，于是“四号”的口气大变，私下里还跟我说：“像你这样大年纪的老专家，应该把你的教学经验写下来呀。”

那时候我的身份提高了，大概不属于“敌我矛盾”了，被调进伙房，帮大师傅烧火。大师傅在上面炒菜，说：“加火。”我赶紧往里塞柴禾。他说：“减火。”我就往外掏。他们允许我把小提琴带进厨房，没事的时候，可以拉拉琴混日子。另外，以前我喜欢业余搞无线电，为此还挨过红卫兵一顿揍，可是到了清风店后期，那些原来理都不理我的军队干部纷纷找我修收音机。每次排长一宣布：“今天晚上放电影。”无非就是《平原游击队》、《地道战》之类，早就看腻了，我赶紧举手报告，申请看家，排长从来不会不同意，因为我的马扎比他的高，我不去，他就可以坐我的。等他们出发了，我就拿出电烙铁、万用表，摆开摊子，搞我的无线电。

5、给我的政治结论

中央音乐学院恢复以后，作曲系、指挥系、音乐学系合并，叫做“作指音系”。虽然我被恢复了工作，开系会、学习也能参加，但基本上什么事都没有，属于靠边站的。早上到公园学气功、打太极拳，回家拉拉琴，晚上搞我的无线电。后来，赵汾让我跟杨鸿年重建指挥系，拉什么人进来都由我来定，大家坐一起，我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包括安伦也一样，他在附中是出名的调皮，而且有一阵很左，不过那时他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全是胡来，何况我对他也做过错事。

文革以后，指挥系第一次正式招生，那一届有邵恩、胡咏言、陈佐湟、王诺文，还有一个翁维智，他们以前是有基础的。比如邵恩，过去在天津歌舞团弹伴奏等等，什么都搞。陈佐湟是附中毕业，后来又跟郑小瑛、韩中杰学指挥。翁维智的听觉和钢琴都好，可以凭听和记忆把贝多芬的交响曲弹下来。另外，当时作曲系通过查三代招进来一些学生，大概有十几个，音乐方面几乎都是白丁。作曲系给他们上了一年预备班的课，包括读谱、视唱练耳等等，后来他们的负责人找我，说有四个查三代上来的学生想学指挥，要我收下。我说：“他们都没经过考试，什么都不会，那怎么行呢。”后来开院务会议，那个负责人又讲了一大堆，说人已经招进来了如何如何，反正有他的理由，大家谈不拢。赵汾那时候已经恢复为院长了，说：“飞立呀，看样子你还是得收，不然怎么办啊？”他一发话，

我当然不好说什么，但是我说：“你一定要我收，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有言在先，不保证他们能成才。”这样就把他们收下了。

谁教呢？我是系主任，有权指定他们的授课老师，但总不能把有困难的学生推给别人。其中一个叫杨建中，想学合唱指挥，于是我和杨鸿年商量，请他收下，其余三个我全包了：

张建林是农民出身，比较用功，毕业后给附中要去，后来当了视唱练耳的学科主任。

王甫建是插队青年，正正规规的高中毕业生，懂一些外语，文化课也不错，所以他的理解力比较强。而且这个人很虚心，凡我讲的，他都努力去做，所以他的毕业成绩还不错。当时民乐系没有指挥，想请他过去，他拿不定主意，于是来找我，说：“民乐我也没搞过，怎么办？”当时我就跟他讲：“你赶快去。”民乐不懂可以现学，但指挥的手法、读总谱、排练等等，很多都是相通的。更何况，当时像邵恩这些有基础进来的，虽然是同一届的学生，当时已经小有名气了，而你作为一个指挥系刚毕业的学生，在社会上找一个工作不那么容易。所以我就跟王甫建说：“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对民乐的知识不够。你赶快下功夫，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不能学的，将来大可以有所作为。”后来他去了，果然慢慢发展起来。那时候民乐指挥最出名的，一个是广播乐团的彭修文，一个是中央民族乐团的秦鹏章，后来他们两个都去世了，可以说，王甫建成了当今最红的民乐指挥之一。

另外还有一个是部队来的，但这个人很特别，不管我讲什么，他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当然我也希望学生能有自己的意见，比如对作品的理解等等，这个我还是很开放的，但在基本功上我绝不放过。这个学生老跟我顶着，虽然还给他上课，但是很难。结果只有他不成才，毕业后一直没能拿得起指挥棒。

马思聪：过去招生起点很低，有的就是从什么都不会开始。70年代我们回到音乐学院，连附中、附小招的那些学生都得查三代，要历史清白、贫下中农之类。比如那些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这是车前子，那是什么什么，他们能叫出名堂，或者用藤条编个东西、抓个蛤蟆之类，这都很快，但是心散了。我有一个学生八

九岁的时候来，真是从白丁教起，怎样握弓、怎样拿琴，光这个就哄了好久。好不容易摆上姿势，一拉，声音不好听，又不学了，两个学期都是三分，学校几乎要把他给开除。但是我发现，他的耳朵非常好，一拉得不准——平时不练琴，当然拉不准——立刻他就有反应，很难受的样子，所以我就把他留了下来。不过那之后，他还是不肯用功，一直到高中才开始好好练琴，那也就是每天一个半钟点，比我年轻的时候差远了。所以后来他当了首席，我就说他“山中无虎猴称王”，没什么了不起。本来他可以更好。

指挥系刚恢复的时候，我把人马都调回来，并且已经开始招生，以为自己没问题了。那时候我的老二安理考上了铁路文工团，一切顺利，只差一个政治审查，但过了差不多得有一年，还没批下来。后来有人跟我说：“黄先生，安理的事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系支部书记俞慧耕知道了情况，赶紧到人事处，催他们快点儿给我下结论，回来以后跟我说，我的材料有厚厚一大叠。

又经过一番折腾，全都审查过了，没问题。于是给我下结论，说：“黄飞立同志的历史问题经过审查，没有发现问题。”并且让我签字。我一看，“没有发现问题”，那到底有没有问题呢？我说先不签，我得考虑考虑。后来又问许多党员、老干部，陈其钢的妈妈肖远过去是我的学生，说：“黄先生，您这个结论是好的啊。你看医院检查身体，都是写‘没有发现问题’，这就是最好的了。”

给我做结论是 1984 年。

1987 年按照“一刀切”的原则，我从系主任退下来。

1988 年，我退休了。

我这一辈子，经历了许多沾沾自喜，也经历了不少垂头丧气，弹指一挥间，半个世纪过去了，可以说，最好的年纪都折腾掉了。电影《飘》中女主角有一台词：“After all, tomorrow is another day!”（不管怎样，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不过，还有多少个明天呢？

【简讯】

一位“历史义工”的自印书

——介绍王坚勇著《折腾岁月小记》

樵 余

作者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有一行意味深长的题词：“还原历史的真相，才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所以我愿意加入为历史做义工的行列。”

这是大连老人王坚勇的自印书《折腾岁月小记》。从书名即可知道此书的内容写的是过去那些民众遭到折腾的岁月里的人和事，即作者在该书《自序》中所说的“毛泽东在位时，共和国那部 27 年的大折腾史”中“自己的亲历、亲为、亲睹、亲闻、亲感的往事”。共计三十六篇。

王老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毕业于大连铁道学院，正当而立之年时遭遇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折腾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退休后，他笔耕不辍，并在晚年学会了用电脑上网，发文章，开博客，曾于 2009 年 12 月获“全国中老年博客大赛十佳提名奖”。

他在博客中发表散文、时评，还用了较多精力写下对那些折腾岁月的记录，他在《自序》中说：“近年来，在网络平台上开阔了视野，已枯竭的认识得到了再生，并吃惊地发现了我们的社会，尚有散布精神毒素的‘文革癖’在滋生；同时看到了广大正义之士在围剿这些罪恶孽根。……责任感驱使我必须把那段本人所知的事，原原本本复述出来”。“历史不但由成功者来写，还要由历史的见证人和亲历者来写，通过文字牢牢固定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卷里。”而这些文字，“更是对那个‘大折腾’的始作俑者，应定性为罪而非‘错’的更多铁证补充”。

令人欣慰的是，这样的“历史义工”正在一天天多起来。

从书中可知，王老还有一项值得文革研究者关注的爱好：他从文革中即开始收集、积累了大量的文革出版物。在同龄人热衷于造反、夺权时，他默默地选择了收攒和记录，他利用在外地出差、学习的机会，收集了全国各地大量的传单、小报、油印或铅印资料、漫画、宣传画以及几十万字的“首长讲话”。从他的收藏品中，可以整理出大部分中央领导人在这期间的行踪和多舛命运，某一造反组织从诞生、发展到消亡的全部轨迹，某一地区文革发展的态势……但他只用于研

究和反思历史，拒绝了任何高价收购的要求。

【小资料】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1968 年 4 月 10 日成立)

主任——

康健民，52岁，甘肃定西（一说榆中）人，兰州军区副司令员，贫农出身

副主任——

张怀礼，50岁，安徽金寨人，宁夏军区副司令员，贫农出身

徐洪学，45岁，江苏宿迁人，六十二师副师长，中农出身

王志强，53岁，河南济源人，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局副局长，中农出身

安建国，25岁，宁夏银川人，宁夏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工人出身，中共党员

常委——

赵炳伦，55岁，湖北麻城人，宁夏军区副司令员，贫农出身

李天冲，49岁，陕西扶风人，六十二师政委，地主出身

许冲波，46岁，山西芮城人，炮十五师政委，贫农出身

李江烈，52岁，河北平山人，原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上中农出身

丁毅民，47岁，山东沂水人，回族，原自治区建工局局长，中农出身

陈养山，62岁，浙江上虞人，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席，自由职业者出身

常乃光，49岁，河北冀县人，原自治区农垦局副局长，中农出身

牟元礼，32岁，四川南部人，自治区农垦局一般干部，中农出身，中共党员

林润忠，37岁，辽宁营口市人，自治区建筑公司工人，城市贫民出身，中共党员

雒学民，36岁，甘肃靖远人，石嘴山矿务局工人，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刘万保，41岁，宁夏银川人，农民，银川红花公社大队长，中农出身，中共党员

【文摘】

关于在英语教学中“编反动口号”的申辩书

艾仁宽

按：艾仁宽，时为武汉东湖中学英语教员，湖南军政界耆宿、著名民主人士唐生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的女婿。文革开始后，学校一些师生写出大字报，指责其在英语教学中有意编了一些“反动口号”毒害学生，他写了这个申辩书为自己辩护。全文载于其女艾晓明所著长篇回忆录《血统》一书（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4 年 4 月第一版 8—13 页）。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我的申辩

我没有编过任何反动口号，现分三个问题申辩如下：

I. 关于寒假作业

1. 这些句子是改错练习，都是由于语法错误，用词错误引起的政治性错误。为了使同学们认真对待，所以叫大家自己动手来改。

2. 这些句子没有一句是我瞎编造的，全部是同学们作业和试卷中的错误，而且基本上都作过讲评，估计同学们都能改。

3. 出题目布置寒假作业是上级的规定，经过备课小组研究，有关领导看过，

4. 有的教师在第三次鸣放中指出，外语改错久已废弃不用了，可是我解放后从未教过外语，根本不知道这一点，从来东湖到出寒假作业，就只教了一学期。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任何一个教师、任何一个同学告诉过我这一点，而我在调来前曾在新华书店买过几本有关教学的书，其中就有一本《中学生英语典型错误分析》。这本书的内容全部是改错，该书 1963 年 11 月出版，1965 年第 3 次印刷，书中类似的句子也同样存在，即语法错误用词错误引起的政治性错误，如 P.115, P.119、P.130、P.134，等等。

II. 关于讲课中的例句

平时上课我举过许多政治性较强的例句，也引用过主席语录。这种作法曾得到过肯定，但按照上级规定，我从未硬性要求同学记笔记，而是由同学们自由摘

录。因此，有的根本不是一天讲的，却跑到一天去了，有的虽是一天讲的，却有当时的具体情况。

1.本非一处的：

a.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第 12 课中的例句。“我不愿意见到他”，是 12 课结束后，练习题中用不定式造句中的例句。当时不光举了否定式，也举了肯定式。后面课时的例句，怎么倒跑到前面去了呢？何况中间明明隔了别人的例句。

b.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这一条语录记得是在期中考试以后，为了鼓励考得不太好的同学而引用的。至于另一条“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则是讲第 7 课的最后一段，为了说明为什么有人叫雷锋为“傻子”，在小组备课时由老师帮我选的。而且引用这一条语录是上研究课，听课的领导和教师很多，既不在一处，又不是我选的，怎么构成了用主席思想反对主席思想的罪过呢？

c.同样，“我国人民一向支持亚非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是第 2 课的例句，“那是三年前的事”，是第 3 课中为了说明一个特殊句子而举的例句。“每天晚上都听到青蛙的喧闹声”是第 11 课的例句。而另一条有关阶级斗争的语录则是以后某一次上课教的。选这类语录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同学们要求上主席著作；我请示过，领导答复是不能放弃课本，但可以选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语录和警句来教，所以才选用的。

2.虽是同一课时，但有具体情况的：

a.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一例句和“雷凯是个神枪手”，据我回忆是第 12 课的例句，但这两句是先后举的例，也还有其它讲课内容。雷凯实有其人，曾来我校作过报告，他是学习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是主席思想使他成为神枪手的，况且有同学问过我类似的句子，所以结合实际，举了这一句，这两句放在一起，实在不能说有什么问题。

b. “我的老师批评了我”，想不起是哪一课的了，当时为了进一步谈谈认识，曾引用主席语录“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而英语句“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放在全句最后的，如何独立成句的？因为英语里原因状语从句，只是从句，不能独立，得有主句才行。

C.关于核爆炸的句子是为了结合实际，一上课就写了，由同学译出后大家热

烈鼓掌。后来讲课文(11课)，课程进行中，有个同学问“单独一个”这个词，我才套用课文写了一句“教室里一个人也没有”。这完全是两回事，完全不是什么别有用心。

3.还有一句“45年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我确实说过这句子的语法不对，不高级。因为在改第6课的练习时，曾改错了带有时间状语“近几周以来”即“××年(月、周)以来”这样一句练习题。小组研究时，组里×老师纠正了我的错误，提出这类句子应该用“现在完成时”而不是“一般过去时”。为此，我曾向同学们检讨过，而这一句也有“45年以来”的时间状语，却用的“一般过去时”，故我认为是错的，又不高级的。上课前曾请组里×老师查过好几本语法书，小组备课时也研究过应如何改正，而且我记得我的备课本上还有具体改过的，只是因为老师说教师无权改课本才只做了以上的交待，根本未谈过这一句的内容问题。

III. 关于单词排列

由于查出上述一些句子，故同学们怀疑很大，对平时听写练习的单词排列也提出问题。但是：

1.单词基本上是按先后出现次序排列的，并无故意颠倒东调西移的情况。

2.多出政治性词汇是四清工作队××同志的意见。因为有一次他看了我们的考试题，认为一般生活用语太多，政治词汇太少，所以我注意了这一点。

3.平时学一课讲究听写一次，这是同学们提的意见，说这样便于督促复习，有利于巩固对单词的记忆。我还记得×××同学就专门写过这样一张意见条子。

以上全凭回忆，因为我的备课笔记、教本，都保存在领导处，可以查对。同学们的笔记有记得多的，有记得少的，也可以核对一下。对我家进行过两次搜查，所有的日记、工作记录、笔记本、思想检查材料，也可以看出一些情况。我49年参军，51年随部队调来武汉，有些首长还可以找得到；我54年转业省商业厅，直到65年调来东湖中学，一直没动过，我过去的情况，也可以调查。但是主席教导我们，“社会实践及其结果是检查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既然效果不好，我当然该负责，当然是罪有应得。而且我解放后从未教过英语，一调来就上课，自己又不虚心，又不谨慎，胡闯一气，岂有不出事的么？何况我确实觉悟不高，水平很低，说错过话，做错过事，这次揪我出来，也是完全应该的。我相信主席

的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问题一定会实事求是地搞清楚的，我准备接受党和人民给我的任何处理。

我的申辩，主要就是这些。

1966.12.16

【编读往来】

[1、欧阳秋来信赞王锐文章](#)

读到几篇王锐先生的文章，都是从民间史料中对文革中的一些重大史实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令人敬佩。在当前官方档案不依法解密的条件下，民间的文革研究者被逼迫另辟蹊径，这也不失为一个方法。据说王锐先生本是一个文革资料收藏家，目前文革资料的收藏者各地都有不少，但能像王锐先生这样把故纸堆中的资料化为研究成果的则不多。希望能不断读到王锐先生的新作。

[2、南晓来信赞刘海鸥文章](#)

读到上期《记忆》转载的刘海鸥的《大串联中新疆行》，令人感到耳目一新，这样放松洒脱的写法，在文革回忆中似不多见。作者没有把过多的眼光集中在文革运动本身，而是更多地关注了文革中的各种人，各种人的生存状态、感情心理，读罢使人久久回味，颇多启发。看来网络真是个好东西，让许多平时被埋没的人的聪明才智都能有充分的发挥空间并得到更多人们的了解和欣赏。